

陈 平 原

转过几道弯,远远望去,果然一树红
梅,正傲雪怒放。没有竞争对手,也
没有欣赏者,倚着佛寺,独立寒风,自

得其乐。数千朵小红梅,顶着厚厚的
白雪,显得不胜娇羞的样子,让人又
爱又怜。

日

本

印

象

 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目 录

小引 / 陈平原 1

序 / 夏晓虹 1

上篇 东游小记 1

窗外的风景 2

东京的古寺 6

木屐 11

“初诣” 15

烟雨佛寺 20

踏雪访梅 24

伊豆行 29

下篇 阅读日本 35

打碑记 36

招魂 40

汤岛梅花 44

神輿竞演 49

历史文化散步 55

从东京到江户 62

文学碑 72

西乡铜像 80

开国纪念 90

“教育第一” 98

“厕所文化” 105

后 记 113





序

——夏晓虹

读书人真是不可救药，“周游日本”最终变成了“阅读日本”，而且读后有感，写成文字，结集成书，这确是平原君一贯的作风。我不知道，假如在一个世纪前，我看到的会不会是“竹枝词”一类的纪事诗，当年出游日本的文人学者，没少为我们留下这些东西。如今，我们还可以借助黄遵宪等人的诗作，探知明治维新以后的日本曾经给予中国怎样的冲击。不过，值得庆幸的是，必须即席赋诗的时代已经过去，若要说清楚对于异国的感受，我觉得散文



黄遵宪



还是好过诗歌。黄遵宪之所以只能以《日本杂事诗》为《日本国志》的副产品恐怕原因也在此。

据说，地球正在变小。“地球村”的说法使远隔重洋的国家都成了我们的近邻，传播媒介的进步，更让我们打开电视机，便可“目游”全球。古语所谓“秀才不出门，便知天下事”，好像确已成为现实。如此说来，了解他国在今日并非难事。但这其中不无误会。距离感的接近其实只令我们对别国平添了一份亲近，以为在地球上任何一处发生的事情，都非与己无关。而对植根于生活方式以及思维深处的文化基因，书本和画面原有力不能及之处。更何况，个人的体会乃是人生经验的一部分，非足履其地，亲接其人，不会有真感动。尽管临行前购买了许多介绍日本文化思想以及风土人情的书籍以备查考，平原君显然还是更相信自己的眼睛与心智。

日本文化与中国文化的关系是个能写好多本书的大题目，不必我说，也非我所能道。平原君从一些小开口进入，借谈日本，反省中国，属于他的别有会心，有此书在，也无须我饶舌。既然“阅读日本”无论大题小题均可不作，只有另寻门径。好在我本与平原君同行，且嗜游胜于善读，故而对于“周游日本”的话题尚可发言，正不妨权充导游，以明行踪。

差不多一个世纪前到过日本的康有为有一方长文别章，在其门人友生的回忆文章中常见提起：“维新百日，出亡十六年，三周大地，历遍四洲，经三十一国，行四十万里。”不说气魄，单是行迹，便令我辈望尘莫及。“历遍四洲”不易做到，追踪前贤，经一国，游四岛，应可实现，谁知还是功亏一篑。虽有大半载的光阴，四国却只在新干线的高速列车上，隔着



车窗，隐设在濑户大桥的另一端，引人遐想。即便如此，我们的游兴之高，已使日本友人惊叹不已。

说是同行，我实比平原君迟到三个月。当我取道香港抵达东京时，节令已进入冬季。大约是东京仅见的窗外那株红枫也不再能坚持，三两日后，叶片便黄萎凋落。整个冬天，只得蛰伏东京，在市内各处游荡。好在学会乘车，可以看地图认道路，穿行小巷，寻找僻寺，游走大街，领略繁华，原也乐趣无穷。东京作为世界屈指可数的一流大都市，国际化程度自是极高。圣诞节银座高雅精致的橱窗艺术，表参道学自巴黎的圣诞灯树，静静等待参观西方印象派画展见首不见尾的长龙队伍，为迎接新年而举办的几十场爆满的贝多芬第九交响乐演出，都是在日本其它各处无法得见的景象。依靠热心朋友的指点，我们有幸一一领会。不过，即使在东京，日本的传统仍未



银座 被国际化淹没。印象派绘画之外，此时最多参观的便是浮世绘画展，特别对《名所江户百景》的作者安藤广重尤有好感。原先在国内难以接受的相扑，易地东京却有了新体认，每年照例举办的新年后开始的大相扑初场及四季重大赛事，竟成为收看最多的电视节目。而大有赢得力士最高级别“横纲”之称的，反是来自美国、入籍日本的曙。所谓“越是民族化，越是国际化”，在此似乎也得到了证明。

进入三月，梅花初绽，预示着春季的来临，我们的株守东京也告结束。第一次远足，便是去以观

日本桥雪晴（安藤广重绘，《名所江户百景》）





水户偕乐园

梅闻名的水户。日本人的酷爱自然，也许因了高度现代化都市生活的阻隔，而更形强烈。电视中日日报道梅花又开几分的讯息，使东京后乐园中的游人陡增。花瓣微张的梅枝，已牵惹得游客驻足不去；几株散漫开放的野花，竟也被精心地以竹丝圈起。待到得见水户偕乐园沿水漫山红白纷呈的梅林，千姿百态，不修边幅，不禁为其蓬勃的生气而倾倒，东京园林的精致中所透现的雕琢实无法与之相比。

三月底，在伊豆半岛突见樱花，又是另一番情致。只因此地较东京偏南，兼之海风和暖，花期先在此登陆。不过，伊豆更让人着迷的还是山岚海色与舞女走过的天城隧道，散落平川的樱树倒也无意争奇。此后，好像成心追随樱花线（樱花在各地的开放，一时间成为电视关注的焦点），从伊豆到东



天城隧道

京，一直寻迹至札幌，半个日本的樱花尽收眼底。此中，最为壮观的究属东京，上野公园、千鸟之渊与多摩川边如云如霞的樱花与如痴如醉的赏花人，夜以继日地互相厮守，自花开到花落，使得恭敬有礼的日本人，在这几日间忽尔脱略形迹，纵情饮乐，迥异平常。

身居东京，横滨、镰仓只算近在肘腋，可小小不言。伊豆途中，一位精通中文的日本朋友以“不到长城非好汉”解“不到日光，莫说最好”的日语俗谚，倒勾起了我们对日光山的好奇心。一百多年前，王韬东游至此，写下一篇《游晃日乘序》，极力描摹山水之胜及日友护送登山的盛情，成为其扶桑之行结束时最精彩的一笔。而此游的发生，即是因闻说该处“土木丹青之盛，穷工极美，甲于天下”，“西人来日东者，无不往游日光，否则以为阙典”（《扶桑游记》卷下），可见“最好”之说由来已久。百年过后，东照宫仍是那般巍峨壮丽（或许更加修饰一新），华严瀑仍是那般气势磅礴（其实因岩崩高度已略有减损），中禅湖仍是那般烟波浩渺（不知面积比前如何），连一路开车送我们登山、观瀑、游湖，直至天黑尽方抵达其长野山中的别墅款待我们住宿的日本朋友，也是那般周到热心。

按照预订计划，五月初，便当由东京转移至京都。但不过十日，我们又沿新干线原路返回，且更驱向东北，目的地是北海道的札幌。大约一国之中，北方人总较南方人显得豪爽，风光也自不同。而北海道的开发不过是一个多世纪以前的事，所取法的美国得克萨斯州城镇格局与建筑风格，使得北海道大学中两行茂盛冲天的白杨树，竟成为札幌的代表物。港口城市小樽，也以厚实坚固的石头仓库构成独特的地方景观。这多少给我们留下一些荒野的气氛，并感觉其中充





盈着活力与沛然不可御的气势。北海道大学也不例外，校园里大面积的丘陵绿地，在日本当真是首屈一指，对于一个岛国来说显得颇为奢侈。更引人入胜的是夜幕降



北海道的白杨树

临以后，草地上便聚集着一丛丛的人群，烧起成吉思汗火锅，欢呼痛饮，烤羊肉的香味弥漫在空气中，处处可闻。我们无缘加入这些快乐的人群，却没有错过品尝美味的机会。在札幌啤酒厂附设的啤酒园里，大块吃肉的同时，我们也畅快地大口喝着泡沫四溢的新鲜啤酒。热情的日本北大的老师，还领我们见识了如同家庭般亲切随便的小酒馆。

作为一次难得的经历，北海道之行在交通工具的选择上也不同寻常。日本国土不算大，新干线列车的运行速度又极高，被称作“寝台列车”的夜间火车只在很少的线路开行。乘此种车去札幌的一段路程，成为我们整个日本漫游中最阔绰的旅行。从仙台上车，坐的是带有电视机与桌、柜的头等车厢，但这仍然不能使我安睡，火车车轮碾压铁轨的杂音一如往常。回程改乘轮船，从小樽出发，走日本海。一路观日落日出、海浪海岛，否则歪倒床上看电视录相，虽三十余小时，亦不难过。

从京都去北海道，鲁迅留学过的仙台本为路经，自不可不游。将鲁迅上课的教室、借宿的民房以及各处建立的纪念碑一览无余之后，心心念念便只在松岛。早已听不只一位日本友人朗诵过俳圣松尾芭蕉的一首名作，若译成汉文，不过



是翻来覆去的几句：“啊！松岛！啊！啊！松岛！！”据说，当年芭蕉目睹松岛，心中生大感动，所有的语言都显得贫乏无味，不足以传美景于万一，便只能反复咏叹其名，使此作在俳句体中别具一格。乘船游行在数以百计绿意葱茏却又姿容各异的大、小岛屿之间，立足岸边远眺这星罗棋布、总名

“松岛”的海上奇观，所能作的便是频频举起照相机与摄像机，感谢自然造化的神奇与人类文明的创造。

松岛以其美貌，入选“日本三景”之一。既得其一，便思占全，免得辜负了好山水、好时机。北上之后，南下已很便捷。6月下旬，即使是海洋性气候的日本，天气也够炎热，此时向南，颇有苦中作乐的意味。在前往九州的路上，我们照例沿途



松岛地图

游观。而横竖说来，广岛都是最重要的一站。

历史上军国主义势力的集结地，使广岛在历次对华战争中均充当了桥头堡；原子弹的爆炸，又让人们在面对废墟时心情复杂。与残酷的战争景象相对照，广岛市附近的宫岛则提供了美妙的人文与自然景观。宫岛的山光海色固然佳胜，不过，若没有严岛神社，其能否入选“三景”大成问题。读

严岛神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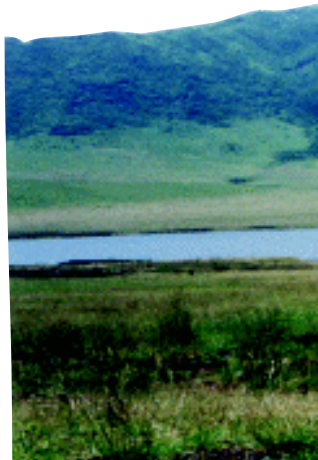




《平家物语》时，对历史上曾经叱咤一时的平清盛家族所信奉的严岛神社留有深刻的印象。举行大战的前夕，到这里祭拜守护神的仪式总给我以悲壮感。而远远从海上看到藏在海湾深处的这组红色建筑的第一眼，便证实了我的感觉准确无误。严岛神社不像一般的神院寺庙建于平稳的陆地，偏偏选址在海滩。来时虽已落潮，但留在巍峨的神社大门附近的水迹，令人自然生出浪击底部支柱、整个神社浮动海面的遐思。最近一次飓风造成的若干殿宇倾覆的后果，至今尚未消除干净。无法把握的不安定状态，与迅速覆灭的平家的命运一样，为壮观的严岛神社涂上了一层悲剧色彩。

仿佛由此设定了基调，悲壮成为我们九州之行的总体感觉。当然，在长崎建造的海外最大的孔庙中，徘徊于七十二贤人的石像群间，引发的只是自豪感。而在佐世保的山巅眺望烟雨朦胧的九十九岛，下山行经日本最大的美国军事基地；游长崎而品尝那首著名的歌《长崎今日又下雨》的况味（初听此曲的日语歌词，是在札幌的小酒馆），瞻仰将近四个世纪前为基督教而流血的二十六圣人殉教纪念青铜像；在骄阳似火的日子，登上为消耗各地诸侯实力而修建的坚固的熊本城，凭吊烽烟遍地的古战场遗迹；于阿苏山火山博物馆观看在此地无数次上演的火山喷发、熔岩溢淌的场景，游目火山地区长流不断的河水、绿草茵茵的牧场；漫步福岡市区，邂逅抗击元军的历史遗存……几乎每一空间与时间里，充塞胸中的都是既悲且壮的旋律。九州不愧为日本勇士的出产地，连至今盛行不衰的相扑运动，获胜的大力士们也仍以到熊本的吉田司家领取证书为荣典。

除了东京，在日逗留期间居住最长的地方便数京都了。正好赶上百年难遇的平安建都一千二百周年，各类庆祝活动



阿苏山牧场



竞相开场。能乐演出、插花展览、茶道表演一时纷集，虽无法细细品味，却足大饱眼福。散布京都各处大大小小古老的寺院，自有一种挡不住的诱惑，我们也如同所有的国外游客，一边抱怨着门票的昂贵（一般五百日元即相当于人民币近五十元一张票），一边仍不自禁地进出。为配合建都纪念，例行

的城市游行娱乐活动“三大祭”也准备得格外卖力。两年前的十月来京都，机缘恰好，观看过以追溯历史为主题的“时代祭”。剩缺的两次，便要



时代祭

靠此行补完。五月举行的“葵祭”，系由春季祈求丰年的仪式演化而来，尚显得颇为简朴。七月进行的“祇园祭”，在神社排练，历时既久，人们的热情也更高。十六日晚间，如潮水



般的人流，相聚在四条乌丸的大街上观看高大的花车。次日，填街塞巷的人群又鹄立于烈日下，等候一辆辆装饰繁华、名目繁多的花车在



葵祭

器乐的吹打声中通过京都的主要路口。这项活动最能显示寺院神社在京都市民生活中的地位，其所以为“三大祭”之首，道理或许也在此。

而在等待“祇园祭”的间歇，我们终于不负此行，抽空圆了“三景”之梦。安排行程的京都大学朋友，先引领我们游览国外来客极少观光却很古朴有味的出石小城，继而乘旅游车沿丹后半岛欣赏海礁断崖与下层置船上层住家的舟屋，终点站便是赫赫有名的天桥立。与宫岛的得益于人工建造的严岛神社不同，天桥立纯然以自然力取胜。特殊的港湾走向与潮汐作用，使泥沙反复冲击形成一道天然的长堤。除去一段小小的缺口以铁桥填补，天桥



祇园祭

天桥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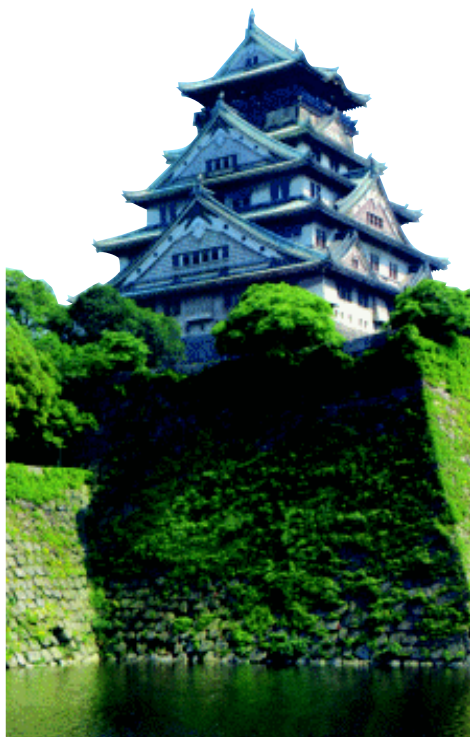


立浑然一体的结构横亘海湾，犹如一条纵贯两岸的天生桥梁。从船舱里赏玩海

上落虹，踏足在这带狭长而坚实的土地上，登临山顶远眺封锁海湾的堤防，我们从各个角度把天桥立看了个够。

应该感谢日本的习俗，喜用“三”这个数目字，而不是

大阪城



如同中国的偏好“八大”与“十全”，我们才得以毫无遗憾地占尽日本的美景。其它三分天下有其二的名胜也不在少，“三名园”中水户的偕乐园与冈山的后乐园，“三名城”中的大阪城与熊本城，“三大建设奇迹”中的新干线与津轻海峡的海底隧道，我们均曾身临其地。我不敢说在日本读了几本书，



倒确实是走了万里路。所经历的名山胜水、市景乡风，足以让我感觉良好。



12

不过，平原君日本归来，写下了近十万字的阅读笔记，我则只在东京与京都分别邮寄过两则应命短文，真令我这位与平原君结伴的游客愧煞。好在此为后话，出游的当时，我可是乐不思其它。

平原君嘱我写一两万字的长序，以充（“充”与“光”形近）篇幅，谁知长行短说，五千多字便已打发掉“周游日本”这个大题目，实在太没本事。

夏晓虹

一九九五年八月十二日，自日归来后一年

上篇 东游小记





窗外的风景

独在异乡为异客，最重要的欣赏对象莫过于“窗外的风景”。毕竟不能整天逛公园或参观博物馆，大部分时间必须坐在书桌前。日本的房间朝阳台一面大都安着落地窗，大概是为了便于“借景”。倘若对面除了水泥建筑一无所有，那该多扫兴！

到达“新家”已是半夜，不辨东西南北。第二天醒来，急忙拉开窗帘，观赏那一幅属于我的风景。真没想到，眼前居然出现一片小树林！不是东京街头常见的侧身墙角的盆景式小松树，而是自然生长的柿子树，大大小小不下二十株。在临近我家阳台的地方，还有一株枝叶茂盛的小枫树。家在四楼，树在坡上，坐在窗口望去，刚好是小树林最富表情的上半身。东京市内地皮昂贵，除了专门设立的公园，难得有如此空地。

转一大圈回来，终于弄清小树林的来历。我的新家背靠东京大学医学研究所，研究所的楼房四周都有林木，尤以我所面对的西北角最为苍翠。周围是库房，人迹罕至，一条小路穿过柿子林。地下都是落叶，穿行时必须拨开挡路的横枝，还得当心随时腾起的乌鸦。研究所有十几栋楼房，也有一座近乎荒芜的小庭园，路边或大树下摆着若干发霉的木椅子。大概这里的研究人员工作太拚命，没有闲暇到室外来休息。敬佩之余不免觉得有点可惜，这么好的风景不该被冷落。

于是，每当夕阳西下，便独自一人在园子里散步。深秋的太阳不晒人，偶尔也到园子里读书。只是空地毕竟不大，一下飞鸟，一下汽车，再加行人匆匆的步伐，还有不时随风飘来的酒精味，在在都提醒你此地不是读书处。当然也怨自己“定力”不足，否则该像曾国藩说的，“苟能发奋自立，则家塾可读书；即旷野之地，热闹之场，亦可读书；负薪牧豕皆可读书”。

刚到时柿子还是青的，不知不觉竟逐渐变红。这时乌鸦开始猖狂起来，越来越让我感觉不能容忍——可又拿它没办法。光顾窗外柿子树的乌鸦们，大概住在离此地只有百米远的自然教育园，那里有大片的树林，是各种鸟类的天堂。柿子青时乌鸦也来走动，好像挺规矩的；柿子红了，乌鸦可就不客气啦，光天化日之下“大开杀戒”，看得我都惊心动魄。十几只乌鸦直扑柿子林，专拣红柿子啄，叼住了就往回飞；过一会又卷土重来。最气人的是，万一啄落了，乌鸦绝不下地拣，而是另攀新枝。红柿子再多，也经不起它们从早啄到晚，从晚啄到早。好在乌鸦很有分寸，绝不啄食半生不熟者。每天早上起来，发现柿子红了一批，到了下午，那些红点又都消失了。浑身漆黑的乌鸦叼着圆圆的红柿子从眼前掠过，





这景象固然好看；只是本想有一天绿叶落尽，剩下满树红果蔚为壮观，就因为乌鸦捣蛋，看来是没指望了。事后想想，也怪自己自作多情。柿子本无主，乌鸦啄食干我何事？总不能以破坏我家风景治其罪！

东京上空飞翔的鸟，最多的莫过于鸽子和乌鸦。鸽子招人喜欢，公园里，广场上，随时可见游客在给食。也许正因为养尊处优，不免“目中无人”，不时摆出一副爱理不理的样子，让自以为是的“施舍者”感觉没趣。乌鸦则讨人嫌，不但没人给食，连可能享用的剩余饭菜都被用网罩住。理由据说是因为乌鸦吃相不大文雅，经常弄脏街道。照我观察，受宠的鸽子固然活得很好，被冷落的乌鸦照样叫得也挺欢，似乎没有一点“心理不平衡”。

那天阳台上飞来一只鸽子，与我隔着玻璃对视。尊贵的鸽子居然光临寒舍，让我受宠若惊，大有“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的感觉。那鸽子不知为何惊魂未定，我起身它便飞走，我落座它才回来。总不能让客人干坐着，找了些饼干和切碎了的苹果放在阳台上。可惜鸽子不见了，大概仍对我不放心。好吧，让你安心享用，我上东大读书去。晚上回来，阳台上果然空无一物。此后一个多星期，刚好每天出门，早上“道别”时，都不忘在阳台上放置食物。照样是打开落地窗便惊飞，不过我相信那高傲的鸽子会回来享用我为它准备的午餐。

天气渐冷，开始设想在阳台一侧的壁洞里为我的小客人建一个窝。星期天不出门，躲在窗帘后面，观看客人如何用餐。没想到鸽子一去不回头，赶来聚餐的是两只乌鸦！难怪人说东京的乌鸦特聪明。

鸽子好几天不露面，不知是生病了，还是赌气。正挂念



窗外的枫树



着，那旧相识翩然而至，而且还带了个新伙伴，在阳台上闹得挺欢。这次再也不孝敬食物，免得人家嫌“俗气”。鸽子闹了一阵就走了，而且再也没回来。我这才恍然大悟。当初它来见我，只因同是“独在异乡为异客”；一旦找到女（男）友，必然弃我而去。这么说来，鸟也讲义气。只可惜我不是公冶长，听不懂其临别赠言。

屈指算来，妻子也将来日团聚了。窗外的柿子林已经落叶，只剩下枝头几颗乌鸦无法下嘴的红柿在随风摆动。现在最担心的是墙角的枫树，照时令早该红透了。若如是，妻子到时，那信中常提及的“窗外的风景”便一无可观了。暗暗祈祷，希望这枫树顶住日紧的寒风。观红叶的热潮已经过去，东京街头的枫树纷纷落叶，每天从学校回来，直为我窗外的枫树骄傲。

不知是“心诚则灵”，还是地气的关系，已经是十二月中旬了，窗外的枫叶才开始变红。

明天妻子就要到了，不知她对这窗外的一树红霞有何感想。



东京的古寺

对于考古学家来说，东京没有“古寺”。东京的寺庙本来不少，可经历江户时代的三大火事，再加上本世纪的关东大地震和美军大轰炸，难得一见百年以上的建筑。即便不计较多次的翻修与迁移，江户开府至今不到四百年，东京的寺庙能“古”到哪里去（《浅草寺史略年表》溯源到七世纪中叶，可屡建屡烧，目前的本堂是一九五八年落成的）？难怪许多到过京都、奈良的游客，对东京的寺庙不屑一顾。半个多世纪前和辻哲郎记录游览奈良附近古寺印象的《古寺巡礼》，至今仍是不可多得的名著；淡交社正在印行的大型系列图录《古寺巡礼》，也以京都、奈良两地为主。手中有一册角川书店编的《图录日本美术》，收录并简介被定为国宝或重要文化财的雕刻、绘画、工艺、建筑，是我游览古寺或博物馆时必



不算什么，在我却可以陶醉好几天。精鹜八极，神游四海，尚友古人……一觉醒来，眼前依然是东京的高楼大厦。既不感伤，也无惊喜，对自己笑一笑，上图书馆去也。

很快地我就明白这里的陷阱：东京的“野外”其实一点也不“野”，我的作业对象并非“原初状态”。寺是重建的，墓是重修的，碑也有不少是重刻的。除了地震和战争的破坏，还有重建时整理者有意无意的“歪曲”。常会诧异江户人为何不讲礼节乱搞石碑，事后想想，可笑的其实不是整理者，而是我之“信以为真”——呈现在我面前的并非“真正的历史”。明白了这一点，“古寺巡礼”时便有了双重的考据任务：既考古人，也考今人对古人的理解。带上一册“江户古地图”（此类图书甚多），还有安藤广重的“名所江户百景”，在东京街头散步，不时会有莫名其妙的叹息或微笑。

相对于观赏国宝级文物时的“焚香顶礼”，摩挲路边饱经沧桑的石灯笼或者街角略为残缺的地藏菩萨，心情轻松自由多了。没那么多谦恭，也没那么多虔诚，用一种通达而又略带感伤的眼光来看待古人和今人，思维自然活跃些。更重要的是，在这种古今对话中，“艺术美”逐渐为“人情美”所取代。所谓“线条”、“结构”、“韵律”等的思虑，实在抵挡不住佛家的“大慈悲”——起码在东京的寺庙里是如此。比如，位于目黑的大圆寺里，有一尊很不起眼的道祖神像，在墙角的大树底下“乘凉”。此乃中国的行路神，在日本则专管儿童和爱情，故刻成男女合体“勾肩搭背”的浮雕。我不知道这一对矮敦敦、胖乎乎、笑嘻嘻的小儿女组成的道祖神是否真有力，一瞬间竟把我“镇住了”。无暇借问作者是谁，也不想考据创作年代，只是隐隐约约感觉到这充满稚气的神像里，蕴含着对世俗人生的热爱，以及周作人所再三赞叹的



浅草寺雷门



日本之“人情美”。

东京寺庙之所以让我流连忘返，很大程度正是这种充溢其间的“人情”。不管是大名鼎鼎的浅草寺、增上寺，还是我居住的白金台附近的若干“无名”小寺，都是有信徒，有香火，有佛事，因而有生命的“活寺”。我很看重这一点，这正是收藏丰富的博物馆所不具备的。参加过大大小小的佛事，也见识了真真假假的信徒，自认对日本人有了进一步的了解。这大概是我逛寺庙的最大收获吧！



10



江戸浅草市（安藤广重绘）



木 屐

小时候不喜欢木屐，主要是嫌重，穿上无法快跑或者蹦跳，玩游戏时总吃亏。

上学了，按规定不能打赤脚，可抄近路需要跳水沟踩田埂，穿鞋实在不方便。把鞋带一结，挂在书包上，光着脚丫子在泥地上跑，挺舒服的。偶尔也把鞋挂在脖子上，但那必须是新鞋才好看。到了学校门口，擦擦脚，穿上鞋，一下子“文明”起来。

十五岁那年当了“知青”，来到一个三面环山一面临水的小山村，终于体会到木屐的好处。村里的水沟不大通畅，加上母猪率领小猪东游西荡（肉猪可圈而母猪必须放养），一到雨天街上猪屎和着稀泥，只有穿着木屐才能安然无恙。村民一般早睡早起，夜里十点以后，周围静悄悄的。巷口传来木屐声，大半是朋友找我聊天来了。石板路上深夜走木屐，

清脆又悠扬。失眠时，数着远处夜行人的木屐声，也能渐渐沉入梦乡。

久居城市，重做“文明人”，只好告别木屐。挤公共汽车或骑自行车，木屐实在不方便；住楼房深夜踱步，楼下肯定抗议。当然也有“从众”的压力，不敢过于“招摇”。已经隐去了的记忆，读黄遵宪和周作人关于日本“下駄”的描述，才重新恢复过来。此次东渡，很想听听东京街头的木屐声。顺便理解黄、周二人之争议。

黄遵宪《日本杂事诗》述及“声声响屐画廊边，罗袜凌波望欲仙”的木屐：

屐有如兀字者，两齿甚高，又有作反凹者。织蒲为苴，



真乳山山谷堀夜景
(安藤广重绘，《名所
江戸百景》)



皆无墙有梁；梁作人字，以布绁或纫蒲系于头。必两指间夹持用力，乃能行，故袜分两歧。

据黄氏考证，此乃中国古制，与其时尚流行于南方的木屐样式不同。周作人赞赏黄氏的观察，不过认定日本木屐的“梁作人字”，“比广东用皮条络住脚背的还要好”。吾乡与黄氏家乡相邻，风俗相通，自是不能同意周氏的意见。穿木屐到底是夹着还是套着方便，很大程度是习惯使然。周作人将其归结为中国女子裹脚故脚指互叠不能衔梁，未免牵强。不同于黄遵宪的风俗介绍，周作人之《日本的衣食住》带有强烈的感情色彩，很能体现其个人趣味：

去年夏间我往东京去，特地到大震灾时没有毁坏的本乡去寄寓，晚上穿了和服木屐，曳杖，往帝国大学前面一带去散步，看看旧书店和地摊，很是自在，若是穿着洋服就觉得拘束，特别是那么大热天。

那是半个多世纪以前的事情了。如今本乡东大附近旧书店仍在，可难得见到穿和服着木屐的读书人，更不要说“曳杖”了。

偶然在校园里见到一位着木屐的学生，看他上身西装，下身牛仔裤，肩上的书包前后晃荡，再配以踉跄的脚步，实在有点滑稽。那学生大概自觉很好玩，一路左右顾盼；我则从这颇具反讽意味的摹仿中，意识到木屐的“死亡”。

那天雪后初晴，我从东大回家，忽闻前方有念佛声。转过街角，见三位僧人各持一面小鼓，匆匆赶路。伴随着鼓声





和念佛声的，便是那清脆的木屐声。大概出于苦行的考虑，天寒地冻仍不着袜。平日走路已属“匆匆”的我，赶上着木屐的僧人也都不易。踩着鼓点，跟在僧人后面念佛，直到实在跟不上才想起应该回家了。

于是，站在路边，目送渐渐远去的僧人，还有那木屐声……



“初诣”

刚刚忙过圣诞节，车厢里、车站外又贴满“初诣”的精美广告。明明是汉字，可就是不明白其意思。读了说明，方才知道指的是新年的第一次参拜。“初”字好懂，“诣”字从颜师古注《汉书》到新版《辞海》，都只作“至”解，最多有往候之意，而不曾引申为拜神祈福。虽说“初诣”乃日本人创造的词汇，但与中国人之“烧头香”习俗大同小异。据说每年初一到初三，日本有一半以上的人参拜神社和佛寺。很想入乡随俗，体验日本人的宗教热情，也为自己祈祈福。

听完新年音乐会，还不到凌晨一点。拿来音乐厅提供的附近有名神社和佛寺的地图，略为商量，选中了日枝神社和增上寺，取其历史悠久且类型不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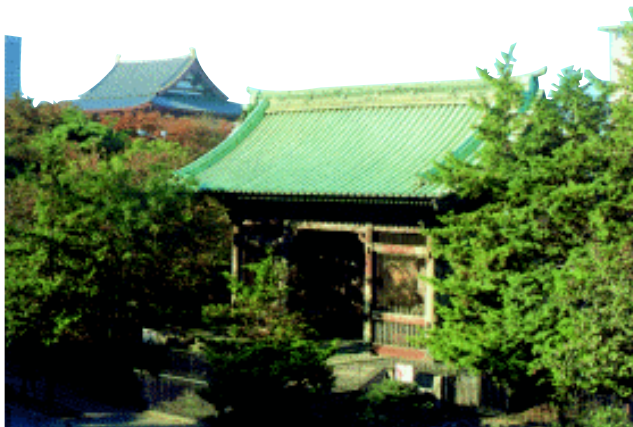
说是“附近”，步行也得半个小时。好在路上并不寂寞，尽可跟着人潮流动。位于千代田区永田町的日枝神社，江户



时代以山王祭闻名天下，原有被指定为国宝的桃山建筑样式的华丽社殿，战争时烧毁了。现在的神殿为钢筋水泥结构，想来无甚可观。神社建在百米高的山崖上，盘旋而上的石阶两边挂满红灯笼，走近了方知是各种小吃摊。这景象十分亲切，一如吾乡之庙会。望着手持破魔矢、捧着达摩像来回涌动的人群，听着四周不绝于耳的欢声笑语，实在无心考察神社的建筑风格。

正殿前面排长队等着敲钟奉纳祷告神灵，一派庄严肃穆；旁边是着白衣的巫女在神乐的伴奏下起舞，为送来破魔矢者行法事。我对神社的规矩不甚了然，不敢贸然参拜，只是默默欣赏。临时搭起的棚子里，参拜者依次品尝屠苏酒，这我倒不妨参加。新正时节，饮屠苏以防病驱邪，这习俗大概起源于汉代，起码《荆楚岁时记》中就有记载。王安石《元日》诗中提及的爆竹、春联和屠苏，在吾乡潮州只留下前两种；没想到在东京补上了“春风送暖入屠苏”。屠苏酒以白术、桔梗、山椒、大黄等中药浸泡而成，或甜或苦可以自己调节。神社的屠苏味道欠佳，远不如我后来在伊藤先生家所饮用的香醇。

饮过屠苏，自认百病俱除妖魔不入，雄纠纠来到平日不大敢光临的神签桌前，呈上一百日元，开始倾听神灵的声音。真扫兴，我得到的是末吉，妻子得到的也是末吉，而且两张神签一模一样。大年初一，神社和寺庙都没有凶签，末吉便是最没运气的了。唯一的安慰是，这下子夫妇总算真的“同命运”了。同行的尾崎君也是末吉，不过签文比我们的略好些。西川君则得了个大吉，笑得合不拢嘴，真令人妒忌。回家查查日本历书出版协会推荐的《平成六年神宫馆家庭历》，果然我今年有“前厄”。书上注明避地东方即可，正好我旅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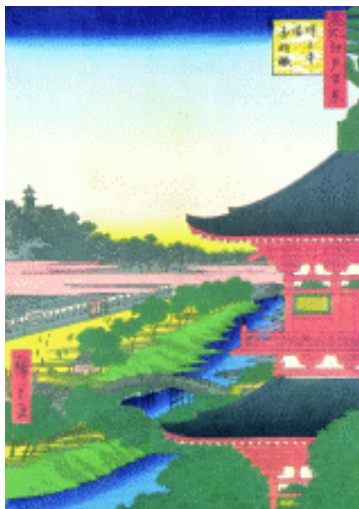


增上寺

东京，不免暗自庆幸。谁知“在劫难逃”，半月后便传来北京家中被小偷光顾的消息。让我大失所望的不只是北京的小偷，也包括东京的神灵。当初见签文不好，我见寺就进见

佛就拜，谁知一点效果也没有。后经高人指点，我才恍然大悟：事关主权，东京的神灵不管北京的小偷。

从日枝神社转到港区芝公园的增上寺，已是凌晨两点。此寺创建于室町时代，江户时为德川家的菩提寺，供有六代将军的灵庙。曾来此参观过被列为国家重要文化财的三门，反倒怠慢了大雄宝殿。这次以拜佛为主，连庭园带大门全都忽略不计。可惜佛像太小，大殿中间又用绳子围起来，大有拒人千里之外的架势。倒是让人奉纳的“钱箱”特别大，大约长十米，宽五米。尾崎君劝我别大惊小怪，说是还有比这更大的。不知是夜深游人倦呢，还是日本人更喜欢神社，反正大雄宝殿里奉纳者不多。



听说历年初诣人数，以明治神宫为最多。看来还有“更上一层楼”的必要。回家好好睡一觉，下午再赶一次热闹。

果然名不虚传，明治神宫里人山人海，远非日枝神社和增上寺可比。二十米宽的表参道挤满了人，如此庞大的纵队竟一望不到头。路边巨大的电视显示

增上寺塔赤羽根（安藤广重绘，
《名所江戸百景》）





屏播放着神宫里正举行的仪式，维持秩序的警察不时发布“建议”，参拜者慢慢向前挪动。真的是“别无选择”，就这么一条参拜之路。古人礼佛需“焚香沐浴”，今人一切从简，删去繁文缛节的同时，也丢弃了必不可少的“虔诚”与“恭敬”。如今被迫排长队，正好借此“修心养性”，培养出一点参拜的“诚意”。

没有人争先恐后，也没有人大声喧哗，保持一定的距离，挪两步，停十分钟。老人多一脸严肃，年轻人则小声说笑。和妻子讨论旁边少女的服饰，评判周围几件和服的色彩构成，不知不觉已挪到了大门边。一看表，总共花了一个小时。进了门不等于就能“登堂入室”，除非你愿意花大钱请神官做法事，否则就只能在大殿外“奉纳”了。周围人都在准备硬币，等着挪到大殿前时来个“天女散花”。往年经济状况好时，撒十元、百元的硬币，也有撒千元、万元的纸币；今年则多挑一元、十元的撒，有个千八百元就能出手满堂彩。

随人流涌到大殿前，撒钱、拍掌、祷告；又随人流涌到东门外。以为还有什么精彩的仪式，发现人群已经开始散去，方知参拜已告完成。接下来的节目是花钱买法物。二三十个



明治神宫

摊位围成一大圈，兜售破魔矢、绘马和福袋。福袋形状一样，可颜色和功用大不相同。自认没有升官发财的希望，挑了那种专保“身心健康”的。把不到半个巴掌大的福袋揣进大衣口袋那一瞬间，心里感觉踏实多了。

回到神宫的入口处，0041 电话局正在做广告，提供免费国际电话。给北京的亲友拜个年，顺便说说我们的“初诣”。还没等我把什么叫“初诣”解释清楚，规定的三分钟时间已经到了。

【附记】

据 N H K 报道，今年初一至初三，全日本共有八千五百四十四万人次参加“初诣”，其中参拜明治神宫的有三百四十八万人次。





烟雨佛寺

吾乡潮州有座开元寺，顾名思义，是唐代开元年间敕建的。小时候听了一脑子关于开元寺和韩愈的传说，也隐隐约约记得那四大金刚的尊容。文化大革命毁佛驱僧时，我不在潮州，无缘目睹。只是在我插队的山村附近，有位被迫还俗的僧人，暇来与他“闲坐说玄宗”。那时开元寺已改为文化馆，既无佛像也无香火，大雄宝殿被用来办阶级斗争展览，各个配殿也都派上用场，我就曾在观音堂里参加过县里组织的乒乓球赛。八十年代重修开元寺，我恰好又出外念书，无法恭逢盛典。虽说此后每次回家乡，都不忘上开元寺走走，但已经没了儿时的那种神秘感与神圣感。坐在菩提树下，望着香火日盛的大雄宝殿，抹不掉当初荒凉的记忆，实在难以参悟。

明知“文革”中各寺庙的境遇大同小异，但没有切身体验，游五台山或洛阳白马寺时，便更多注意佛像之庄严。俗

话说：远来的和尚会念经；还应该加一句：远去的寺庙会显灵。道理其实一样。只有“出凡”，才能“入圣”；对于太熟悉的和尚与太亲近的寺庙，很容易发现法衣底下的“世俗相”。常人不觉，转而寄希望于陌生的“远方”。我也喜欢远方的寺庙，与其说出于信仰，不如说是想借此了解此地的历史、文化与艺术。

有幸到日本来“游学”，感觉就像挂单的和尚一样，无拘无束到处游荡，但仍以佛寺为主。阅读古代及近世日本的

雨中的桥（安藤广重绘，《名所江戸百景》）



最佳途径，除了博物馆，就是佛寺。日本的“国宝”和“文化财”多集中在寺院，其中雕刻占了九成，建筑占了六成。经历了明治初年的排佛毁释以及神道的迅速崛起，佛教在当今日本人的精神生活中已经不起主导作用。即便如此，日本寺庙之多仍然令人叹为观止。据说单东京一地，大大小小的寺庙就有两千多座，我游览过的尚不足十分之一。

浅草寺五重塔



忽忆及唐人杜牧的《江南春绝句》：“千里莺啼绿映红，水村山郭酒旗风。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历来注家多喜欢在“四百八十寺”上做文章，强调此诗主旨为讽诫朝廷之大建佛寺糜费钱财。我却对“烟雨”二字感兴趣，总觉得这里面有一种说不出的朦胧美。此次东游，更证实了我的直觉：寺庙的魅力离不开“烟雨”。对于真正的信徒来说，进寺庙自是不必考虑“阴晴圆缺”；可像我这样缺乏坚定信仰的人，往往需要外缘来接引，这时“烟雨”便起了很大作用。

烟雾缭绕的大雄宝殿，与微风细雨中的石塔，同样给人暂时脱离尘世的感觉。“烟”好烧而“雨”难求，因而，我更喜欢后者。

下雨了，如果记得带雨伞，我会顺路拜访寺庙，或者就在路边站一会，聆听断断续续随风飘来的念佛声。和尚所礼何佛所念何经与我无干，我只是欣赏这种“幽玄”的情调。此时路上行人稀少，寺庙益显凄清，大都会的喧嚣暂时隐去，心境格外澄明。远观佛寺，若有若无，若隐若现，平添几分神秘的意味，不若丽日中天时的“造作”。东京的寺庙大都为战后所重建，且因地皮昂贵而缩小规模或干脆改为楼房，外观上远不及奈良、京都的古寺有魅力。只有在虚无缥缈的烟雨状态下，可以忽略新寺庙造型上的缺陷，而专注于隐隐传来的梵钟。

当然，如果忘记带雨伞，或者雨如倾盆，那还是赶快回家好。





踏雪访梅

昨夜大雪，电视报道东京附近若干高速公路关闭，铁路上发生撞车事件。今早起床，撩开窗帘，但见白皑皑一片。对面楼顶积雪十几厘米厚，路边栏杆悬着的雪挂也有手掌宽。忽忆起半月前游附近寺庙，似乎在那里见过一株寒梅，今日说不定已悄然开放。东京不乏赏梅的好去处，旅游书上多有介绍；可我更愿意拜访“驿外断桥边，寂寞开无主”的“隐士”，何况还有踏雪之“雅趣”。只可惜当初没在意，记不得此梅隐居何寺。好在那几个寺庙相距不远，不妨逐家寻访。

说来惭愧，虽然念过不少咏梅诗词，可“踏雪访梅”这还是第一次。粤东平原气候温和，不适于寒梅的生长。小时候，每当忆及林逋的“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陆游的“月中疏影雪中香，只为无言更断肠”时，脑海里浮现的却是家乡常见的“桃红李白”。学画时，我的梅花总显得

过于肥大，无论如何出不来“冰清玉洁”的感觉。直到负笈广州，方才见到“众里觅它千百度”的梅林。只是广州四季如春，有“梅”无“雪”。十年前初到北国，最为激动的“事件”便是终于见到真正的“雪花纷飞”。此后，每当窗外洁白一片，我便“踏雪”去也。遗憾的是，北京有“雪”，却又无“梅”。

雪仍在下，不过变得若有若无。风过处，抖落一树梨花。撑着雨伞，朝最远的常光寺走去，目的是一路包抄，保证不会错过。

常光寺有“国史迹”——“福泽谕吉先生永眠之地”纪念碑，地图上作了标示，很好找。寺不大，两层楼房，乃战后所建。上次已经侦查过了，除了福翁之碑，无古迹可寻。墓地静悄悄，修剪过的矮树丛上铺着一层厚雪，墨绿色的碎叶缀着如此“飘逸”的白花，居然给人一种沉重的感觉。大概是看多了葬礼上的花圈，很容易由白花联想到死亡的缘故。奇怪的是，墙角真的摆着四个挺厚实的花圈，这在东京的墓地里很少见。走近一看，不禁哑然失笑：原来是寺僧废弃的汽车轮胎，一夜大雪竟成了天然的“花圈”。



福泽谕吉墓





福翁墓前雪地上，已有两行清晰的足迹。脚印颇为零碎，大概来访者年纪不小。墓前供养的鲜花，本就以白色居多，一夜之间忽然“长大了”；远远望去，分不清哪是雪哪是花。正在墓前合十，忽闻妻子惊叹，说是又发现了一处“古迹”。就在福翁墓的斜对面，有一座“幼稚舍创立者和田义郎碑”，碑文乃福泽谕吉所撰。福翁不用汉文写作，猜读起来不免稍费工夫。以我的日语水平，见到复杂一点句子就头痛，碰上俳句或和歌则只有投降一路可走。

忽想起鲁迅留学东京时，不知是否也有踏雪访梅的雅兴。之所以有此联想，就因为《野草》中有一则，提及朔方的雪花“永远如粉如沙”，而江南雪则“是极壮健的处子的皮肤”。后者“隐约着的青春的消息”，正是借此寒梅透露出来：“雪野中有血红的宝珠山茶，白中隐青的单瓣梅花，深黄的磬口的蜡梅花；雪下面还有冷绿的杂草。”东京的气候及生活习惯，近绍兴而远北京，想来其雪也是远朔方而近江南。鲁迅见此梅花点缀的东京雪景，是否也给予“滋润美艳”的评价？我没有在江南踏雪访梅的机缘，正好借此行补读鲁迅先生的《雪》。

东京的寺庙门口多有应时的和歌或俳句，我大部分“熟视无睹”。没想到今日隆崇院所书白隐禅师诗句，既好解又切题，似乎为我而设：“旧年寒苦梅，得雨一时开。”白隐乃江户时代复兴临济禅正宗的名僧，有《夜船闲话》、《槐安国语》等传世，不知此诗句出自何集。隆崇院并无梅花，倒是有一尊延命地藏大菩萨铜像颇为可观。此像已有两百五十年历史，原为纪念一心院专念寺某上人说法一万回而造，一九二七年方才移居此寺。铜像本不算高大，加上座基也就四米左右；可周围是墓地，菩萨身上又披着雪，静穆中确有普渡众

生的慈悲在。此寺的僧人颇勤快，墓地里几条主要的小石径已经打扫过了，而且路边的雪堆也略作修饰，没有突兀的感觉。尽管我更喜欢白茫茫一片因而显得圣洁的墓地，但还是很感激寺僧的好意。

对面的清岸寺又是另一番景象。两个少女正捧着小树丛上的积雪，一边说笑一边打闹，见游人来便回屋里去了。此地寺庙与民居杂处，没有截然的分界；再说日本和尚允许娶



妙圆寺踏雪
访梅



妻育儿，寺庙有少女出入一点也不奇怪。我访此寺，纯粹为了那株两百多岁的樱花。时近立春，樱花尚未苏醒，半截枯死的主干上堆满白雪，跃跃欲试的旁枝也镶了一道白边。倚着树干的，是一幢两米高的石灯笼。东京随处可见石灯笼，但要找古拙质朴且显得很有年纪的也不大容易。关键是那象征岁月流逝的青苔，不大好伪造。或许是因为下半截有矮



小的柏树遮丑，上半身有苍老的樱花陪衬，再加上雪天雪地作背景，此君忽然“古雅”起来了——记得上次来访时并无如此风韵。

就剩下离家最近的妙圆寺了，寒梅准在那儿！转过几道弯，远远望去，果然一树红梅，正傲雪怒放。没有竞争对手，也没有欣赏者，倚着佛寺，独立寒风，自得其乐。数千朵小红梅，顶着厚厚的白雪，显得不胜娇羞的样子，让人又爱又怜。眼中只有梅花，不免怠慢了雪地。下坡路滑，险些摔了一跤。为避“乐极生悲”，只好谨慎着脚下。好在寒梅不会舍我而去，总能一步步接近……

又是鲁迅，不过这回是《在酒楼上》：“几株老梅竟斗雪开着满树的繁花，仿佛毫不以深冬为意；倒塌的亭子边还有一株山茶树，从暗绿的密叶里显出十几朵红花来，赫赫的在雪中明得如火，愤怒而且傲慢，如蔑视游人的甘心于远行。我这时又忽地想到这里积雪的滋润，著物不去，晶莹有光，不比朔雪的粉一般干，大风一吹，便飞得满空如烟雾。”今日北京之飞雪迎春，并不总是如粉如沙、如烟如雾；未名湖边红男绿女的游走嬉戏，更使得白茫茫的雪地充满生机。久居燕园，本不以鲁迅南雪北雪之说为意；直到目睹此红梅之“傲慢”，方才明白江南雪的“滋润美艳”，确有不可及处。只是阴差阳错，我本南人，居然像鲁迅所说的，用“北方的眼睛”，来阅读并惊叹“江南的雪”；而且还必须借助此异国的红梅。

一九九四年一月二十九日初稿，岁末修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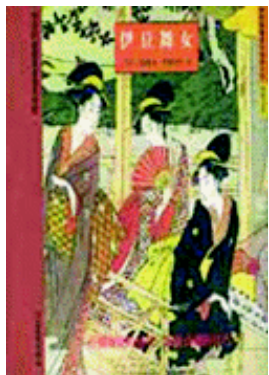
伊豆行

三日伊豆行，饱览山光水色花香鸟语，也品尝了名闻遐迩的海风和海味。可最让我难忘的，却是此行浓厚的文学色彩。开始以为是为了满足主客的“雅兴”而刻意安排，回家读旅游指南，方知此乃伊豆行的保留节目。以前也见过“文学之旅”的广告，只是一笑置之；实地体验，惊讶文学与旅游相结合所产生的经济效益竟如此之大。同行诸君互相笑谑，庆贺自家从事的工作不再毫无用处了。

明知带文学名著游山玩水显得有点造作，我还是舍不得拉下川端康成。主人大概嫌我准备不足，釜屋君带来了梶井基次郎，芦田君则携上松本清张。于是，旅途之夜，变成了日本文学“读书会”。川端康成和井上靖二位因著作多有中译本，客人也都拜读过，这次就“免了”。看两位教授讲课的认真劲，似乎缺了这四家，游伊豆就不够格似的。



原先并无游览热海之计划，是根据我的提议增加的。我之知道热海大名，一因早稻田大学演剧博物馆里坪内逍遥的画赞《热海远望》，一因黄遵宪《日本杂事诗》中“要从热海浴温泉”的诗句。黄诗自注：



《伊豆舞女》

豆州热海有温泉，老树参天，游者云集。诸省郎吏，多尽室而行者。

其时热海作为旅游胜地已享盛名，一个多世纪后的今天，更因其交通便利，备受东京人的青睐。

从东京开车到热海，不到两个小时。已在伊豆半岛中部的天城汤岛町订好旅舍，因而未能领略热海的温泉。在颇负盛名的人工沙滩散步，看小孩拾捡成人故意撒下的贝壳，十分感慨。大概这就是日本之所以为日本。中国的教科书开篇便是地大物博历史悠久，而日本的教科书则强调资源不足危机四伏。在不太有利的自然环境中争取尽可能大的生存空间，这种意识根深蒂固。去年秋天在神户六甲山的回转式展望台上观风景，赞叹其人工岛的巧夺天工，同行的日本友人马上声明：这是不得已而为之，日本不像中国“地大物博”。初来日本，看不惯其风景的人工化，以为未免“小家子气”。逐渐理解这种古已有之的危机感，体贴其于有限中追求无限的心情，方能欣赏在人造沙滩上撒贝壳这样不太自然，但又显得相当优雅的行为。

正对着沙滩的广场上有一棵“假作真来真亦假”的阿宫松，那是为了纪念明治作家尾崎红叶的长篇小说《金色夜叉》

而“创作”的。松树的一侧立着红叶山人及其《金色夜叉》纪念碑，另一侧则是小说中男女主人公贯一与阿宫的塑像。妻子不太愿意在此塑像前留影，虽说是根据小说情节立像，可贯一踹阿宫的动作以及倒在地下的阿宫伸手哀告的神情，让她不高兴。好说歹说，才使其从“被踹”的感觉中走出来。妻子不算合格的女权主义者，尚有如此反应，想来此塑像日后必有厄运。



夏目漱石

吃过热海的荞麦面，转道修善寺町。此处温泉也很有名，许多文化人来此疗养兼创作，近日在东京举行的“修善寺町所藏日本画展”，竟是此地一位旅店老板结交画家的“纪念品”。参拜过千年名刹修禅寺，也见识了已经接近绝迹的“混浴”——就在寺边不远的免费露天温泉“独钻之汤”。面对着观光图上十几个景点，举手表决，居然一致同意就访夏目漱石。此碑很不好找，在别墅区背面的小山坡上转了半天，未见明确标志，只好栅栏边停车。眼前是一条铺满松针和碎石的山路，半信半疑往前走，拐过两道弯，三米多高的夏目诗碑赫然出现。一九一〇年八、九月间，刚写完《门》的夏目君因胃病到此地的菊屋旅店休养，其间病情加剧，直面死亡时顿悟生命的尊严，于九月二十九日作如下汉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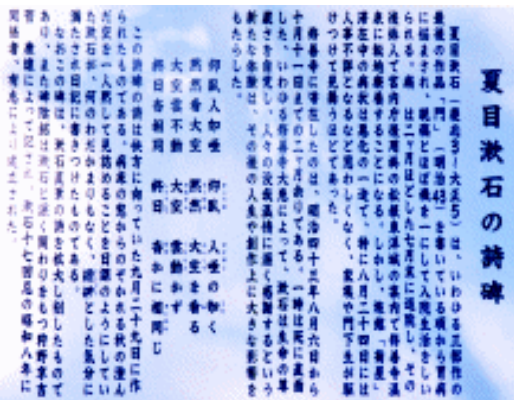
仰卧人如哑，默然看大空。

大空云不动，终日杳相同。





夏目君的
汉文及书画修养
甚深，见过其去
世前不久书写的
此诗条幅，一手
真草潇洒飘逸。
这四句诗近乎偈
语，主要表达悟
道的心境，非以



夏目漱石诗碑

文学性见长。据说这段经历对他后来的创作风格颇有影响，故文学史家相当重视，我因不谙此道，不敢妄加评议。本以为路远地偏，就我们能寻幽探胜；没想到刚拍过照，又陆续来了两三拨游人。

车走西伊豆环山路，在达磨山顶观看伊豆落日，别有一番滋味。

夜宿汤岛天城，浴温泉，听釜屋先生讲梶井基次郎的故事。当初梶井与川端同在汤岛静养兼写作，二人过从甚密。前者的小说充满孤独与绝望，直面死亡且善用象征手法，可惜三十二岁便英年早逝，故名声远不如后者显赫。日本人似乎对“夭折”的艺术家格外感兴趣，信浓速写馆专门收藏并展出“薄命画家”作品，小樽文学馆中则有许多“薄命诗人”的照片和手迹，参观者除了人生无常的感慨外，大概还会平添一层“千古文章未尽才”的惆怅。我没读过梶井君的作品，无法判断到底是其经历，还是其小说让世人如此感动。

第二天一早，沿着当年梶井拜访川端必经的小路，来到其寄居的汤川屋。此旅店位于猫越川边，终日得闻流水潺潺。老板正在屋外锯木头，见有客人来访，也只是微笑着点点头。

梶井基次郎文学碑



门口一块“小小文学馆”的木牌，楼里则有一间专门收集梶井文学活动资料的展室，入室参观者捐一百日元，作为每年举行纪念活动的费用。上一代老板与旅客梶井君略有交情，于是在梶井君去世后着意筹建此文学馆。旅店旁边山坡上，建有梶井基次郎文学碑，整块山石上刻着他致川端信的手迹。四周的小树和石阶错落有致，收拾得很整洁，好在并不显得过于修饰。大概附近多温泉的缘故，樱花早开早谢。来时东京樱花尚含苞待放，此地则连“落英缤纷”都已成过去。

比起忧郁且早逝的梶井君，得过诺贝尔文学奖的川端康成更为世人所称道。川端君久负盛名的《伊豆舞女》写作于此地，为整个伊豆半岛的旅游业作出巨大的贡献。至今东京每天仍有多趟开往伊豆的“舞女号”列车，旅游巴士上更不时掠过装扮成“伊豆舞女”模样的导游小姐的情影。最让人拍案叫绝的宣传品还是属于此书的“发祥地”：走在汤岛街道上，忽然发现下水道的铁盖上居然铸着《伊豆舞女》中的男女主人公。设计者大概缺乏想像力，让舞女和学生整天与污水打交道，而且忍受车碾人踩，实在非我辈所能接受。

当年学生和舞女从汤岛到下田经过的路，如今不再通行。承芦田君雅意，开车绕一大圈，转到已废弃的天城隧道南口。在阴冷的隧道里唱歌，回声效果很好。遥想当初从这里走过的文学人物（从抒情的《伊豆舞女》，到推理的《越天城》——松本清张此作未见中译本，倒是其《砂器》早为国人所熟悉），不知可曾“引吭高歌”。隧道北口多有游人走动，





也立着几块说明性的木牌，当然不会忘记提醒此即大名鼎鼎的“舞女隧道”。只可惜木牌上没有标明隧道长度，随身携带的各种旅游指南也都漏了这一笔，只好由我来补阙——踱了一遍，共六百五十步，约合四百五十米。

其实，在隧道怀古之前，我们还参观了伊豆近代文学馆。之所以倒过来讲，纯属文人积习，为了“文气”而牺牲“真实性”。文学馆乃此次伊豆行的重点，很想将其作为“压轴戏”来唱。只可惜贪玩，对花时费力的文字考据不大感兴趣，只是走马观花一番。到过伊豆或写过伊豆的知名作家实在太多，这里展出的一百二十家几乎囊括了大半部近代日本文学史。此馆最可骄傲的，一是《伊豆舞女》的原稿以及六次改编成电影的相关资料，一是出生于此地的历史小说家井上靖。刚好碰上了“井上靖与丝绸之路”专题展览，拍拍披满征尘的越野车，再观赏那熟悉的西域风光，颇为亲切。井上的小说多以古代中国为背景，我很喜欢；不想在此见到他“沼津”时代的家。在复原的建筑物周围徜徉了好一阵，听水车，看浮云，于宁静中感觉生命的跃动。只是限于管理规则，未能“深入堂奥”——但愿这不是对我辈读者的暗示。

还有一件小事值得一记，在文学馆附设的餐厅用午餐，妻子要了一份名为“舞女”的套餐，又贵又不好。还是我出来主持公道：谁让你吃的是“文学饭”？

下篇 阅读日本





扪碑记

研究文史者多喜欢读碑，我也未能免俗。每次出外旅游，读古碑是主要节目。之所以强调“古碑”，因今人之碑多粗制滥造，文既不雅，字又丑陋，再加立意卑俗，几无可观。这里所说的“碑”，既包括由帝王封禅祭天竖石称碑发展而来的功德碑，也包括由宫室宗庙里竖木称碑发展而来的墓志铭——后者更为我所看重。起码从东汉蔡邕《郭有道碑》起，碑就有序有铭，而且立在墓上而不是放在坟中。虽说像刘勰所赞让人“观风似面听辞如泣”的墓志铭难得一见，读读同时代人略带夸张的评价，顺便欣赏古代的书法与石刻，也是一种兼及文史与艺术的享受。

没想到访学东瀛，还能继续这种享受。最早提醒我注意东京的“古碑”的，是现任教京都大学的金文京先生。“古碑”其实不古，远者三四百年，近的也就四五十载。不是说此后

不立碑，而是或只刻名讳和生卒年月，或改立日文的歌碑、句碑。江户和明治时代不少名人之墓，都有汉文撰写的墓志铭，是我阅读这一段历史的最佳教材。于是，天晴日好且有闲情逸致时，总不忘携妻子游古寺，扪古碑。

说“扪碑”，既写意也写实。历经地震和战火，现存的“古碑”并非原貌，或翻刻或移位。翻刻的容易辨认，移位的则必须发挥想像力，否则会惊讶东京的古墓老比例失调。又要保存古物，又要顾及寸土寸金的商业利益，于是有“缩碑”之说。大概现在的日本人很少光顾那些汉文撰写的墓志铭，因此常有碑背靠着围墙或两碑相距甚近以致不堪卒读者。这个时候就只好“扪碑”了。新宿净轮寺中江户前期数学家关孝和之墓乃“都史迹”，可碑阴靠墙，我只能摸出前后两行，实在没有体力读完全文；目黑大圣院有大正年间移入的受幕府弹压的切支丹T字形石灯笼，中间那幢两侧各刻一句七言汉诗，可因为旁边两幢夹得太近，摸了半天也没弄明白所言何志。

也有因流连忘返，不觉已是万家灯火，只好改“读碑”为“扪碑”的。“扪碑”虽“雅”，可实在不方便。不到万不得已，决不出此下策。倘若是自家的过失，不能怨天，不能怨地，也不能埋怨碑建得不合理，只好夫妇互相推卸责任了。

积习难改，除了“读史”，还想“品文”。这可就有点麻烦了。《文心雕龙》“诔碑”篇云：“夫属碑之体，资乎史才，其序则传，其文则铭。”“史才”不仅指叙事技巧，更兼“不伪饰”的史家精神；后者与墓志铭专标祖宗盛德的文体特征相左，颇难真正实行。古来为人撰墓志铭者，绝少不“谀墓”，故难得好文章。日本人自然也不例外。以提倡古文辞名世的荻生徂徕，其墓志铭由居高位的弟子藤忠统撰写，有传有铭，





可就是言之无物。端起架子歌功颂德，尽是“天降文运斯人云受”之类的套语，焉能有好文章？借鉴传记手法，在列举德行的同时刻划人物，是墓志铭成功的奥秘。涩谷祥云寺的荒川显德碑（冈崎壮撰），叙事之余插入关于传主相貌、举止以及性情的描写，最后来一句“夙能国风，晚年尤多佳咏”，显得摇曳多姿。

要说文章之美，我最喜欢的还是港区泉岳寺的《烈士喜剑碑》。撰者林长孺有《鹤漆文钞》传世，黄遵宪《日本杂事诗》将其列入“馀子文章亦擅场”。此碑收入文钞时，评者多誉为奇文传奇人的“必传之作”。一句“喜剑者，不详何许人，或云萨藩士，盖奇节士也”，省略了许多常见的废话，且有扑朔迷离的神秘感。接着是喜剑如何辱骂国亡而“游荡不已”的大石良雄，听说赤穗四十七义士复仇后，方知错怪了忍辱负重的良雄，于是赶赴江户，自刃于其墓前。整个叙述充满戏剧性，笔法颇类太史公。赞叹过此“古之侠者”的“奇节”，该轮到讲建碑的经过了。本以为是强弩之末，没想到还能如此出奇制胜：



泉岳寺的烈士喜剑碑

中西伯基亦奇士也，恒喜谈忠臣烈士事，嗜嗜不离口。尝憾喜剑有此奇节，而世多不之知也，欲别建一石于泉岳寺，略纪事迹，以示后人。资费金若干，来征文于余。余时年方二十七，未尝作金石文字，固辞，不可，乃约自今学文十年，而后草之。时余贫甚，伯基乃留其金，使余自救。尔来往苒过二十余年，今则伯基年逾六秩，余亦五十余，皆颓然老矣。余乃为文出金，致诸伯基，遂偿两债。嗟乎喜剑之死



《鹤梁文钞》



固奇矣，伯基此举亦奇矣，独恨余文不奇耳。

黄遵宪在开列一大串“以文名世”的古文家后，称“东人天性善属文”，其中之佳作“不难攀跻中土”。此《烈士喜剑碑》大概可算一例。

不过，据明治三十一年出版的大桥义三所著《高名闻人东京古迹志》，喜剑虽隐身江湖，却并非“不详何许人”，乃肥后细川家之浪人，本名大川源兵卫。想来当年确是失考，不会是林氏为作文而故弄玄虚，不然立碑时会引起公愤的。

大桥义三此书又名《古墓之露》，专门记载其时东京尚存的名人之墓，包括武臣、国学、儒家、侠客、经济、医术、俳谐、烈士、妇人等三百余众。此君趣味与我颇为相近，可惜不记碑文，而自撰的介绍文字又过于简单。除了关于喜剑的考证，还有一则记载有趣，那就是将日本的“小说界泰斗曲亭马琴”，比诸中国的李笠翁和西洋的莎士比亚。



招 魂

偶读梁启超主办的《新民丛报》第五号，得悉光绪二十八年正月初三，中国驻日公使蔡钧曾于东京九段坂之偕行社宴请中国留学生。两百多“郁以山河故国之思，肆以春夏少年之气”的留学生与公使共享“团聚之乐”，唯一的缺陷只是因此地乃日本陆军军官公所，不能允许龙旗飞扬。

读完这篇《中国留学生新年会记事》，总觉得气闷。所谓“偕行”，自是取意于《诗经·秦风·无衣》中的“岂曰无衣，与子同裳。王于兴师，修我甲兵，与子偕行”句意。明明知道“偕行社”乃日本陆军为纪念甲午战胜中国之役而募资兴建，为何众人仍能“其乐融融”？那时“排满”一说尚未通行，总不能说战败的是“满清”而不是“中国”？大概学子们一心效仿日本变法维新，只好不计前仇。此前康有为不也曾设想借兵日本匡扶光绪？可见那时中国读书人对日



本的感情相当复杂。甲午之战固然警醒国人，但更暴露了大清帝国的脆弱，无形中加剧了列强瓜分中国的步伐。正如坂本太郎所说的，此后，“清国就像一头倒下的、任人宰割的巨兽一样可怜”（《日本史概说》）。对于中国的近代化进程来说，那一仗其实是致命的：既堵死了中国在亚洲崛起所需要的国际空间，又宣告洋务运动的破产，此后只能走政治革命一路。史家曾经庆幸“因祸得福”，使得落后的中国快步进入社会主义。百年回首，尘埃落定，人们有理由思考“另一种可能性”。

此代表日本之崛起与清国之没落的“偕行社”，在当年可能是领导潮流的时尚建筑。夏目漱石就曾以古式灯塔边盖起“偕行社一般的新式砖瓦建筑”这种不古不今的“滑稽”现象，作为现代日本的象征（《三四郎》）。不想打听此“新式砖瓦建筑”到底毁于地震还是战火，附近的靖国神社更能引起我对中日两国之间百年恩怨的思考。

一八七九年王韬撰《扶桑游记》，叙其游览为纪念“维新之际义士捐躯而殉国难者”诏筑之“招魂社”——此即“靖国神社”的前身。那时中日之间尚无战事，王氏对日人借招魂鼓民气十分赞赏：

每逢设祭之日，角抵竞马，烟火杂沓，鱼龙曼衍，极为热闹。此亦足以见日廷恤典之攸隆，而民生忠义之气奋发而不能自己也。

倘能百年后故地重游，王韬不知作何感想——反正我没王君那么超然，看到的不只是“忠义之气”，更包括“腥风血雨”。

走进仍是“树木郁蔚苍翠如幄”的靖国神社，心情格外



靖国神社的和平鸽

沉重。平心而论，这是东京最为幽静也最为肃穆的神社。倘若不认汉字也不懂历史，纯从观光角度评判，此地不愧为“胜景”。可惜树林里到处悬挂的第几师团第几连队的慰灵标志，在在提醒我记起那场给亚洲各国带来巨大灾难的侵略战争。迫于外界的压力以及日本国民对战争的反省，神社的布置已经相当收敛，陈列品的说明尽量采用低调；可这仍然改变不了其为军国主义“招魂”的嫌疑——这也是亚洲各国对日本官方正式参拜靖国神社极为警惕的原因。

在日本，“灵魂信仰”古已有之，将死于非命的亡灵尊奉为神而祭祀之，这种想法很有“人情味”。因其不分敌我，只要是死于战乱的人，一律供养，以慰其亡灵。明治初年，这种想法依然流行，比如东京惠比寿附近的台云寺中有座慰灵塔，便是祭祀“日清战争”中阵亡的中日两国军人。而靖国神社之突出“为国捐躯”，使得这种“已在国民的宗教意识中扎根的慰灵传统有了本质的改变”。此后，必须是效忠于天皇和大日本帝国的，才有资格享受祭祀。这种置幕府军队与外国士兵之死于不顾的“招魂”，在推行天皇崇拜和军国主义的同时，培养了民众的“残忍心”——很难说这与太平洋战争期间日本军队在中国以及东南亚的暴行没有关系（参见村上重良《国家神道》第三章）。当年梁启超等赞赏日本人之“祈战死”，只讲激发“尚武精神”，不问是否“慈悲为怀”。这种

狭隘的“爱国主义”对国民灵魂的扭曲与污染，并非只是日本独有的“偶然事件”。

东京所有的佛寺和神社，都在“祈求世界人类和平”。不妨将此作为日本民族对于过去历史的一种反省。这一国民心态在靖国神社里也有所折射，那几百只专门喂养、定时诊查的和平鸽，便是例证。冬日的午后，阳光照在稀疏的树林间，雪白的和平鸽三五成群腾飞上下；洁净的砂石地上，母亲带着小孩与鸽子嬉戏，父亲在一旁录相——但愿孩子长大后能记得的，不只是“鸽子”，更包括“和平”。

并非有心“参拜”，故而旁门出入。转到表参道，方才发现巨大的鸟居以及大村益次郎铜像。此君被誉为现代日本军队的创建者，一八六九年任明治政府兵部大辅，实行军政改革，同年被刺身亡。东京的“招魂社”，正是其主持创建。记得夏目漱石小说《三四郎》中的原口先生不断咒骂此铜像，说是“不如建造一座艺妓的铜像更高明些”。大概正像小说所交待的，原口之所以“咒骂”，很大程度因为他与铜像的制作者是“死对头”。搬开历史人物功过之争，单从铜像艺术本身着眼，原口先生不该对这尊“日本人”最早的“西洋铜像”如此苛刻。夕阳余晖中，高高在上的大村君，着草鞋，披羽织、战袍，持望远镜，一脸刚毅，颇能体现那时“和魂洋才”的人格理想。

铜像的长篇铭文出自明治维新的中坚，曾任太政大臣的三条实美之手，汉文不错，书法也甚佳——那毕竟是一个刚从“和魂汉才”转为“和魂洋才”的时代。

靖国神社的大村
益次郎铜像





汤岛梅花

东京赏梅的去处很多，对我来说，最方便的莫过于东京大学附近的汤岛天神。也正因为太方便了，总以为后会有期，不知不觉竟错过了好时机：第一次拜访时，“有女初长成”；第二次则已是“半老徐娘”了。没能见到其最为灿烂的“青春”，总觉得遗憾。

闲来遐想，或许是菅原君洞察世态人情，故意不让参拜者心满意足。世人多对得不到的东西格外怀念，且在想像中不知不觉将其理想化。比如我吧，就因为留下了“遗憾”，汤岛梅花给我的印象，反而比花开似锦、游人如织的东京后乐园、水户偕乐园还要美好。

汤岛天神的梅花其实少得可怜，名为“梅园”，也就十几株。套用刘禹锡的《陋室铭》：花不在多，有“骨”则秀；园不在大，有“气”则灵。“骨”乃虬蟠苍劲，这点大概不

会有太大的争议；“气”指人文氛围，则不见得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对有人文精神滋润的“自然”情有独钟，大概远不只我一人；要不单从“风景”论，此园实在说不上出类拔萃。汤岛梅花的魅力，很大程度来源于神社祭祀的“学问之神”菅原道真。再加上东大的魅力，此处成为高考学生祈祷的最佳场所。因而，即便说不上“谈笑有鸿儒”，起码也是“往来无白丁”。

菅原道真



菅原道真（八四五—九〇三）乃平安前期的文入学者，曾任右大臣，蒙冤屈死后，日本国内天灾不断。人们相信这是菅原的幽灵在作怪，于是在平安京的北野建社祭祀，供奉其为“天满大自在天神”。朝廷还赐他“火雷天神”封号，希望借其威力压服雷神。中世以后，“火雷天神”逐渐演变成为专司文章、诗歌的“学问神”。荻生徂徕《菅庙》诗云：“菅公儒雅士，千岁事堪嗟”；“忠冤尤霹雳，诚感唯梅花”。于“儒雅”、“霹雳”外，又添了“梅花”。日本本不产梅，七世纪前后方由中国传入。《怀风藻》中已有咏梅诗，此后的儒者雅士吟诗作文时更离不开梅花。大概正因为如此，在世人眼中，最配得上“梅花”的，当属此“儒雅”之菅公。

既然祭祀的是“学问神”，周围名胜自然都与学问有关。进入神社，最引人注目的，是立于梅园中央的《汤岛神社一



千年祭碑》。
碑大而园小，
有点不成比例；照常理推想，可能是当初立碑时，神社与梅园的规模都远比今天大。此汉



汤岛神社

文碑立于明治三十三年，由“敕选议员文科大学教授正四位勋三等文学博士重野安绎”撰写。重野君号称日本汉文第一，当年与黄遵宪颇多交往，黄氏《续怀人诗》中有一首是献给他的：

得诗便付铜弦唱，对局何曾玉袜输。

绕鬓青青好颜色，绝伦还似旧髭无。

黄氏自注：“东人称君为三绝：一能诗，一善弈，一美髯也。”《续怀人诗》撰于出使新加坡时，所怀日人包括伊藤博文、榎本武扬、秋月种树、宫岛诚一郎等，半为官僚，半为文人，都是其使日时的好友。在东京游览名胜，常能见到黄遵宪及其友人的遗迹，故《日本杂事诗》、《日本国志》以及《人境庐诗草》都是我绝好的“旅游指南”。此前此后来日的中国人，要不没他的文名，要不没他的地位，极少像他那样所交多为“当世闻人”。甲午战争前，日本人普遍对中国仍心存敬畏，慕名结交者比比皆是。而这些明治时代的名人，其文章功业，如今在日本也成了供人凭吊的“文物”，这也是我

访古时总不忘携上黄氏诗文的原因。

梅园里还有一块汉文碑，也是立于明治年间，刻的是菅家遣戒二则（后来在京都的北野天满宫发现相同的石碑）。其中第二则曰：

凡国学所要，虽欲论涉古今，究天人，其自非和魂汉才，不能阙其阃奥矣。

日本古时崇拜中国，故以“和魂汉才”为理想人格。幕末的洋学家佐久间象山在批判汉学空疏无用的同时，提倡“东洋道德西洋艺”。明治以后，日本迅速西化，理想人格也随之改为“和魂洋才”。《日本国志·学术志》中提及朝廷为

保存汉学而倡“斯文会”，《日本杂事诗》也对“抱遗编守祭器”的“汉学之士”深表同情。作为中国人，黄氏对日本的汉学由盛而衰大发感慨，其中包含“私心杂念”。想来当初立碑汤岛的诸君，也不无借古讽今，对抗西学狂潮的意味。只是时过境迁，参拜者们大概不会注意到此中可能蕴涵的“苦心孤诣”。

《东京都历史散步》一书提及汤岛天神，介绍的是十七世纪中叶铸造的铜制鸟居、十八世纪中叶所立“奇缘冰人石”，以及为新派剧名家泉镜花所建的笔冢。所有这些，对我来说没有多少吸引力，反而是神社周围悬挂的几千块绘马，令我大开眼界。

游览各处神社时，我总是留心供祈祷者书写





心愿的绘马，希望借此了解日本人的内心世界。别的神社里“寄进”的绘马，所祈者五花八门；而汤岛天神则清一色全是“学问”——除了升学，还是升学。日本人注重学历，能否考取名牌大学乃生死攸关。故绘马上所写祈祷者的心愿，不是考上大学，而是考取某大学的某专业。作为局外人，见到居然有人祈求菅公保佑其考取东京大学的“分子化学”或“天体物理”专业时，心里总觉得好笑。菅原道真学问再大，毕竟是千年前的古人，能读懂这些绘马吗？

祈求者一脸严肃，让你实在笑不出声来。久而久之，反被其虔诚所感动。

很想也买块绘马，只是不知道该求些什么。早已过了考大学的年龄，生活琐事又不好意思麻烦“儒雅”的菅原君。况且，日本的神是否管得了中国的事，没把握。还是省点吧。

【附记】

偶读周作人《自己的园地·和魂汉才》，其中提及菅原道真，从《民间信仰史》引录其名言：“凡神国一世无穷之神妙，非他国之所得而窥知，汉土三代周公之圣经，虽然可学，但其革命之国风，所当深加思虑。”这话正是上述北野天满宫和汤岛天神所立“菅家遗戒”的第一则。要说“和魂汉才”的提法，还是第二则更直接些。



神輿竞演

读周作人的《日本之再认识》，深为其中的一句话所打动：“要了解日本，我想须要去了解日本人的感情，而其方法应当是从宗教信仰入门。”认定从宗教入手，是理解一个民族心灵的最佳策略，这话今天看来平淡无奇。可周作人想强调的，其实不是这一“通则”，而是日本人的崇拜仪式中往往显出“神凭”或“神人和融”的状态，可见真正“支配着全体国民的思想感情”的，是神道而不是外来的儒家、佛教或西洋科学。作为例证，周作人举出抬神輿的壮丁“非意识的动着”，脚步忽东忽西，忽轻忽重。

这话给我的印象实在太深，以至一见第十九回“日本秋祭”的广告，马上赶往明治公园。到了那里才弄明白，广告上所说的“神輿竞演”，只限在十一月十四日那一天。前面几天只是一般的“庙会”，对我来说没有多大的吸引力。



连日秋雨，早上出门时天色不佳，阴沉沉的，真担心又是空跑一趟。明治公园里游客不多，“演员”却不少。十几基神舆已经安然就座，广场上来回穿梭的多为身着“半缠”的游神人。看台上摆着百十张椅子，大概因为天气不好的原因，观众寥寥。十点整表演正式开始时，三分之二的椅子依然无主。先是童男童女的武藏国府太鼓，继以武藏流的龙神太鼓，后者用各种夸张的造型击鼓，再伴以人声叱喝，挺有气派。最让我感兴趣的是其服饰：或黄衣红袖黑字，头扎白布；或黑衣红袖白字，头扎红布，配上短裤和草鞋，显得生气勃勃。

不过，我还是更喜欢抬神舆者穿的“半缠”，因其显得随意和自然，没有“舞台化”的嫌疑。“半缠”乃江户时代庶民穿的衣服，对襟，无领，长及膝盖，穿时系以布腰带。抬神舆者穿的“半缠”，印有所属的町会、神社或同好会的名称和徽章，也有以江户时代最领风骚的消防队命名的。“半缠”的制作工艺和视觉效果都颇类贵州的蜡染，前胸后背图案化的汉字尤其让我感觉亲切。进园时摇奖，很想得到悬着的那件“半缠”，可惜阴差阳错，只得了一袋文具。

神舆终于在鼓声中出场了。没有《江户神舆春秋》等书所描述的作为前导的提灯、艺妓、神乐和歌踊，只有“光秃秃”的十几基神舆。四根方形大木抬着一基镂花着彩的神舆，几十乃至上百名穿草鞋或只着袜子的抬神者，一边叱喝一边垫着碎步，有节奏地行进。四周围着的同伴，手舞足蹈，呐喊助威，不时交替入阵。经过观礼台时，随领队一声令下，众人将神舆举过头顶，然后欢呼而去。神舆有大有小，有精有粗，以吾乡赛神的经验，竞演时赛人也赛神。规模最大且最为金碧辉煌的神舆，属于湘南连合神舆保存会。尽管观众对这基装饰最漂亮的神舆报以特别热烈的掌声，我还是喜欢那

些比较朴素的；或许是因“保存会”三字扎眼，总觉得其表演的成分太多，而宗教意味不足。

神輿原非神社专有，《平家物语》中便有山门僧众抬神輿诉讼的描述。只是明治维新后神佛分离，神輿才归神社的神官管理。江户时代的祭祀仪式以山车为主，明治以后神輿才逐渐风光起来。体积庞大的山车行动不便，实难适应现代都市生活，大地震后便销声匿迹了。随着神社地位的下降和世人宗教信仰的淡薄，至今仍活跃在东京街头的“神輿”，也越来越演变成一种民俗活动，少了柳田国男所说的“神輿发野”时的“神人和融”。到了必须组织“保存会”并发起“竞演”时，这种仪式便免不了带表演成分。

中午休息时，游神人散落在公园各处，有吃饭聊天的，有排队摇奖的，也有嬉笑打闹的。我则抚摸着停在一旁的神輿，鉴赏着顶上精美的凤凰、四周的勾栏和鸟居，还有前后的朱雀玄武和左右的青龙白虎。拍一下悬在四角的风铎钵，叮咚声在微风中荡漾。想像着当年游神人的神秘和迷狂，不禁惘然。

神田明神祭礼绘卷 禁惘然。



那边乐声又起，是泰国舞蹈团在轻歌曼舞。说好下午两点神輿再次“竞演”，此前该是泰国歌舞的天下。没想到神輿真的“发野”了，游神人提前出征，且多即兴表演。这回神輿上站着一位略施粉黛的少女，口吹哨子，手挥纸扇，合着节奏前俯后仰，算是在指挥行动。神輿其实



神田御禮田
飯祭
中田協
上圖

萬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
二十四
二十五
二十六
二十七
二十八
二十九
三十
三十一
三十二
三十三
三十四
三十五
三十六
三十七
三十八
三十九
四十
四十一
四十二
四十三
四十四
四十五
四十六
四十七
四十八
四十九
五十
五十一
五十二
五十三
五十四
五十五
五十六
五十七
五十八
五十九
六十
六十一
六十二
六十三
六十四
六十五
六十六
六十七
六十八
六十九
七十
七十一
七十二
七十三
七十四
七十五
七十六
七十七
七十八
七十九
八十
八十一
八十二
八十三
八十四
八十五
八十六
八十七
八十八
八十九
九十
九十一
九十二
九十三
九十四
九十五
九十六
九十七
九十八
九十九
一百







无待人指挥，不过有妙龄少女在架子上“舞蹈”，总是添光彩。一位不够两位，两位不够三四位。只是架子上颠簸，一不留神就掉下来了。这下子可热闹了，十几基神舆半竞赛半自娱，越游越野，动作幅度越来越大，兴奋的吆喝声淹没了舞台上的高音喇叭。如果不是偶见神情庄重的长者，单是那些似乎玩得挺开心的少男少女，实在无法想像这就是周作人所说的日本人热烈而神秘的宗教仪式。

我认准了一基神舆，跟在后面，合着节奏，垫着碎步，慢慢行进，自认挺好玩的。很想挤进去肩一下神舆，切身体会游神的感觉。只是不知人家有无禁忌，而且如此潇洒的“半缠”中杂进一个“牛仔”，实在大煞风景。记得乡下抬木头时讲究“合拍”，生人不合拍很容易扭伤腰。想来抬神舆也必须训练，否则很难做到齐心又齐步。

第二天到图书馆翻阅有关神舆的书籍，果然强调这种共同荷重的协调，代表了“和”之意义。要求游神人默想山崖端坐，险路夜行，处于一种“无我”或“无意识”状态，方能挥洒自如。这几种近年出版的书籍，不大谈论神舆的宗教意味，而多在“下町情绪的象征”或“人生的大感动”上做文章，正与我所理解的日渐民俗化的“神舆竞演”相一致。

很遗憾没能赶上浅草或汤岛的神舆出巡，有神社和佛寺做背景，大概游神人和观众都会多几分虔诚。不过，公园“竞

浅草神社

演”这一形式，倒是无意中凸显了“神舆”在现代日本的真实处境。





历史文化散步

刚到北大求学时，未名湖边偶尔还能见到宗白华先生散步的背影。那时《美学散步》出版不久，其中许多隽言妙语，常被大学生们挂在嘴边。正像宗先生所说的，“散步是自由自在、无拘无束的行动”，可以偶尔在路旁折一支带露的鲜花，也可以捡起别人弃之不顾的燕石。“散步者”悠然意远而又怡然自足的生活态度，我辈后生其实只能心向往之。倘若只是锻炼身体抑或浏览风景，这种“散步”不难；可真要像宗先生那样，于一丘一壑、一花一鸟中发现无限，并借以体验生命、激情与诗意，如此“散步”则不易——不只需要闲心、悟性与幽情，还需要一定的生活经验和历史文化知识。这就难怪长者一般比少年更长于此道。

“散步者”之悠然，除得益于个人修养，更取决于客观环境。虽有“大隐隐朝市”之类的说法，我还是很难想像一



个人能在车水马龙、摩肩接踵的状态下悠然地散步。南朝刘孝威诗云：“神心重丘壑，散步怀渔樵。”可见，古来“散步”，总是与幽静的“丘壑”连在一起。现代社会日益都市化，即便在高楼大厦的夹缝中多保留几个街心公园，也难得从容散步的心境。

到东京的第二天，在住处附近发现一块刻着地图的锌板，上题“历史文化之散步道”。此散步道从日比谷公园到目黑站，分为三段，共八公里长，地图上标出了沿途的历史遗迹和文化名胜。对于渴望了解东京历史文化的我来说，这散步道实在太合适了。

于是，上午念书，下午携妻子访古。一座寺庙、半株古树、几块残碑，都能让你流连忘返。真没想到，繁华的大都市里，居然隐藏着这么多幽深的风景。“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看来陶令的想法并非绝对不可能实现，高楼的阴影还在，可旁边的寺庙竟寂静得听得到虫鸣。东京有一千多座佛寺，旅游者常去的不过一二十座，其余的尽可作为寻幽探胜的好去处。除了寺庙，还有古道、建筑、史迹等，如此漫游，不啻于阅读“历史”。天性好奇，不习惯被人家牵着走，总觉得既是散步，就该自由自在。不时灵机一动，横生枝节，八公里的散步道，竟走了六七天。

正庆幸走完了“历史文化之散步道”，目黑站旁边的另



历史文化之散步道

一块锌板，让我顿失游兴。那是从目黑到调布的“散步道”，长约十二公里。这还不算，日比谷公园那边也有新的散步道。后来才知道，东京此类“历史文化之散步道”甚多，根本不可能一一拜访。



东京人的生活节奏很快，地铁站里尚且一路小跑，实在难得悠闲的散步。设立“散步道”，目的大概正是为了培养其对历史文化的兴趣。因为，就自然风景而言，东京没什么可夸口的；但如果希望了解江户乃至日本的历史文化，则东京大有可游之处。

其实不只是东京，各地都有类似的“散步道”，只是标示的方法不一样而已。好多旅游图册上除了介绍名胜古迹外，还标明各景点之间步行所需的时间。就像快餐食品风行世界，步履匆匆的现代人大都只能满足于“到此一游”。“走马”无法“观花”，坐在客车里张大嘴巴听导游解说的游客们，难得真正体味旅游之趣。要求游客下车，使用自己的双脚和眼睛，在一种即便是短暂的“散步”状态中冥会古今——这种设想不可谓不佳，只是实行起来不易。历史文化之散步，除了需要“昂贵”的时间，还需要同样得之不易的背景知识。看日本人捧着厚厚的“某某历史散步”之类，在各名胜古迹按图索骥，真不知道说什么好。按理说，既是散步，就不该如此紧张；但现代人没那份知识与才情，随便走走固然潇洒，很可能一无所获。自然风光取其触目惊心，越出乎意料越好；名胜古迹则必须事先预习，旅游时方才能“精鹜八极神游万仞”。

在日本，观光是一门重要产业，精美的旅游指南随处可见。东京、京都等大城市里繁忙的地铁或电车线路，甚至各自月出一刊，推荐本月“最佳散步道”。此类自由取用的广告



读物，对引导游客的去向起了很大作用。记得谷崎润一郎的《漫话旅行》曾攻击铁道部和旅游局的宣传，使得名胜古迹成了城市的延伸，糟蹋了大好风光。但这是没办法的事情，政治上的民主化与文化上的平民化，使得谁也无权垄断知识，独占风月。要求雅趣者，只能人弃我取，因而也就更容易显出手眼高低。

历史文化散步之最大特点，莫过于将眼前的风景与古时的场面相重叠，在思接千古的同时，超越平淡乏味的日常生活。因而，此类“散步”或多或少带有“怀旧”的意味。能被后人记忆的“千古”，必然或波澜壮阔或神秘幽深。只是具体到每个散步者，不可能直接面对古人，只能借助于传世的文献。这就决定了散步者的所思所感，很大程度受制于其接受的历史文献。平日读书有限，不免常常临时抱佛脚。倒是国木田独步的《武藏野》早有译本，给了我明治时代东京的最初印象。此次东游，距独步开始描述武藏野风光正好九十八载。说来真是巧合，我在东京散步的季节，与独步一样，也是自初秋至翌年的春天；独步隐居的涩谷，离我寄宿的白金很近，常有顺路拜访的机会。百年沧桑，昔日东京郊外的“诗趣”，如今安在？很希望能像独步那样，“漫步于原野，徘徊于林中”。世田谷、小金井、新宿、白金……那些熟悉的地名还在，涩谷的道玄坂与目黑的行人坂也都“别来无恙”，只是没了林间的小径以及遍地的萱草。在独步留下足迹的这片“昔日的原野”散步时，总忘不了《武藏野》中那段令人心醉的描述：

在武藏野散步不必担心会迷失路途。在任何一条道路上信步走去，到处都有值得你看，值得你听，或是值得你感动

的事物。只有在这千百条纵横贯通的小径上漫步的人，才能真正领会到武藏野的美。不论是春、夏、秋、冬，还是清晨、白昼、傍晚、深夜，不论是在月下、雪中、风前，或是在下雾、结霜、飘雨以至秋雨绵绵的时候，只要在这些小路上茫然前行，随意地左转右弯，那末，到处都有着足以给我们满足的事物。（此处借用金福的译文）



很难说武藏野的变迁是祸是福，“大都市”对田园风光的吞噬，非独东京然。让我感慨不已的，并非几乎不可阻挡的都市化进程，而是现代人感觉的日渐迟钝以及趣味的日渐粗俗。都市自有都市的美，只是难得有独步那样诗意的眼光。

散步者的被感动，固然与外界的刺激有关，但更重要的是个人一时一地的心境。到过许多号称“日本第一”的名胜，可要说印象深刻，还属出石之行。从京都乘山阴线北行两个多小时，在丰冈市转汽车再东行一小时，方才来到出石古城。此地现为兵库县出石郡出石町，人口不过两万；但中世时却因迅速崛起的山名时义一族六分天下得其一，且与织田信长

“逐鹿中原”而名垂青史。站在有子山上的出石城遗址，俯瞰今日平静的小镇，想像五百年前的刀光剑影，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

小城游客甚少，但观光中心、旅游手册、名所标志，加上佛殿神社以及美术馆和史料馆，应有尽有。如果单从旅游业角度考虑，如此铺排必定赔钱；想来当地居民并非纯

出石古城





为招徕顾客，而是愿意生活在这么一种历史文化氛围中。在古风犹存的街道漫步，拍拍因风吹雨淋而变得黝黑的木板房，摸摸路边长满青苔的石灯笼，闻闻仍在飘香的酒藏，再敲敲经王寺里寂寞的梵钟，一切都显得那么熟悉，那么亲切，仿佛回到了我的家。“回家的感觉真好”——

出石古城
尽管我从未在类似的古城长期居住过，但那一瞬间的感觉是如此真实，以至我忘记了这是一座异国的小镇。

出石行乃平田君所设计，我事先没有阅读相关资料，访古时不免有所遗漏。散步者对历史文化的特殊兴趣，别人是无法取代的。回到家中，翻阅在小城书店买的《出石历史散步》，发现此地出过两位我很感兴趣的人物：一位是明治时代的思想家，东京帝国大学第一任校长加藤弘之；另一位是江户中期高僧，对佛法与剑法都有精湛研究的泽庵和尚。前者的出生地就在经王寺旁边，自然不会被忽略；后者晚年隐居的宗镜寺藏在山脚，竟失之交臂，实在可惜。

不管在东京为荻生徂徕和福泽谕吉扫墓，还是骑单车在京都市内转悠，寻访罗振玉、王国维遗迹，我都是有备而去，因此不会空手而归，多少总有点收获。在小地方旅游可就没这个便利，猛然间撞到一处古迹，根本来不及查书，那时只能靠平日的积累。正因为近乎“考试”，反倒有一种特殊的韵味。

阴雨连绵的初夏，我与妻子赶往长崎县的佐世保市观光。接车的松冈君塞过来一叠旅游手册并征求意见，对此地一无所知的我们则宣称“客随主便”。于是，半个小时后，我



们来到了弓张岳展望台上。其时风雨飘摇，视线大受限制。主人不断地表示歉意，说是晴天时可清晰地看到左边的九十九岛和右边的平户市。我到过日本三景之一的松岛，能想像得到九十九岛的景色；倒是这不在旅游计划中因而也毫无了解的“平户”，让我浮想联翩。



首先浮现在脑海的，是一块我从未见过的石碑，以及苏曼殊的一首七绝：“行人遥指郑公石，沙白青松夕照边；极目神州余子尽，袈裟和泪伏碑前。”此绝句题为《谒平户延平诞生处》，第一次听先师黄海章先生含着老泪吟诵，颇受震撼。我对平户的了解，除了延平郡王郑成功诞生于此，再就是元朝舟师之折戟沉沙。元世祖至元十八年（一二八一），范文虎、阿塔海奉命将兵十万，以战船九百征日，在此地遇风暴全军覆没。晚清来日的中国文人，不管是使东大臣何如璋，还是一介书生黄庆澄，船泊平户时都喜欢凭吊古战场；可惜《使东述略》和《东游日记》均只作考证而不发议论，无法窥见其真实想法。

轮到我来发怀古之幽思，中日间又多了几重恩怨。昨晚还在广岛的和平公园徘徊，转眼间变成远眺平户古战场，几百年历史风云涌来眼底，让人不知如何评说才好。本是悠闲的散步，没想到竟变得如此沉重。看来，“历史文化散步”也有不尽如人意处；尤其是当你想“万虑皆忘”时，过多的历史感会搅得你不得安宁。

一九九四年九月三日于京西蔚秀园



从东京到江户

“从江户到东京”，那是史家的拿手好戏，事实上图书馆里确有不少以此为题的学术著作。“从东京到江户”则不符合历史时间，只有像我这样热心而又固执的游客，才会如此阅读日本这部大书。“倒着读”似乎名不正言不顺，但本来就不是专家，没必要故作深沉，尽可凭兴趣随便翻翻，说不定还有“千虑一得”的时候。

“江户”位于隅田川汇入东京湾处，因此而得名。虽说考古学家将最初的“东京人”溯源到几万年前，



德川家康

可江户作为一个重要城市登上历史舞台，却只能从庆长八年（一六〇三）德川家康就任征夷大将军并在此地设立幕府开始。此后两个半世纪，江户一直是日本实际上的政治中心。明治元年（一八六八），江户改称东京，虽无迁都之诏，但因天皇及政府均在此地，自然便是首都了。

中国派出第一任出使日本大臣是在明治十年（一八七七），驻节的地点是“东京”而不是“江户”。中国人对“蕞尔小国”的邻居另眼相看，是因其“明治维新”而不是“封建割据”。此后百年，中日两国恩怨甚多，不管出于何种目的，中国人关注的始终是维新以后的日本。因而，“东京”之大名如雷贯耳，“江户”则逐渐消失在历史深处。

也有几个例外，比如黄遵宪、章太炎、周作人、戴季陶等，便都对“江户”大有好感。黄氏驻日时接触的多为幕府旧臣或日渐衰微的儒学家，对新政之崇拜西洋颇有微辞，对幕府之“深仁厚泽”相当赞赏。这种对“江户”及主政两百余年的德川氏的怀恋，《日本杂事诗》中时有流露。章氏几次流寓东京，最长时达五年之久，诗文中屡屡提及的却是“江户”。太炎先生好古，读古书，写古字，自然喜用古地名；但更重要的是，当年中国人在日本的感觉，“一半是异域，一半却是古昔”。周作人《日本的衣食住》中提及夏曾佑、钱恂在东京街上欣赏店铺招牌之文句字体，“谓犹存唐代遗风，非现今中国所有”。而这种“唐代遗风”，正随西化狂潮而逐渐失落，我相信这也是章氏留恋江户的原因。

近年周作人的随笔大受欢迎，其喜欢江户文化也就变得“路人皆知”了。倒是戴氏不大为人提及的《日本论》值得介绍。此前谈论日本的，多强调明治维新的伟大意义，戴氏则提醒大家不要“忘却德川时代三百年的治绩”：“在维新





以后一切学术思想、政治能力、经济能力，种种基础，都在此时造起。”单从革命无法“输入”或者封建造成文治武功的竞争，很难充分说明幕府统治的合理性。不过，不再将“开国”作为日本成功的唯一因素，戴君确有远见。

几年前初渡扶桑，因来去匆匆，像绝大部分游客一样，我只看到了繁华的大都市“东京”。这回有机会在大街小巷转悠，慢慢品味，感觉上越来越接近“江户”，或者说，越来越体会到现代日本人及其生活里残存的“江户情调”。说实话，我很喜欢这种“情调”；但限于学识，无法把它准确表达出来。还是谈谈个人的游历吧。

登上位于新宿的东京都厅顶楼，俯瞰阳光下车水马龙的大都市；或者坐在新大谷饭店的旋转酒吧，观赏远比星空灿烂的都市夜景，不只一位日本朋友告诉我：这是日本人学习西方一个半世纪的结晶。这话里充满自豪，但也夹杂着一丝不易察觉的辛酸。表面上日本的西化速度最快，也最成功。但深入接触，你会惊讶不断“拿来”、“拿来”的日本人，骨子里相当保守，真的是“和魂洋才”。

明治初年的“鹿鸣馆文化”，只不过昙花一现；善于学习的日本人，始终没有“全盘西化”——尤其是在思维、感觉与趣味方面。三千寺庙与神社，无数江户食品与习俗，还有仍很活跃的相扑与歌舞伎，在在提醒你这是在东京而不是纽约或巴黎。有发展旅游业或者提倡爱国主义的嫌疑，但日本人似乎也真的喜欢原有的生活方式。到居酒屋聊天，到小巷深处散步，到普通人家做客，你都能够感觉到这一点。



鹿鸣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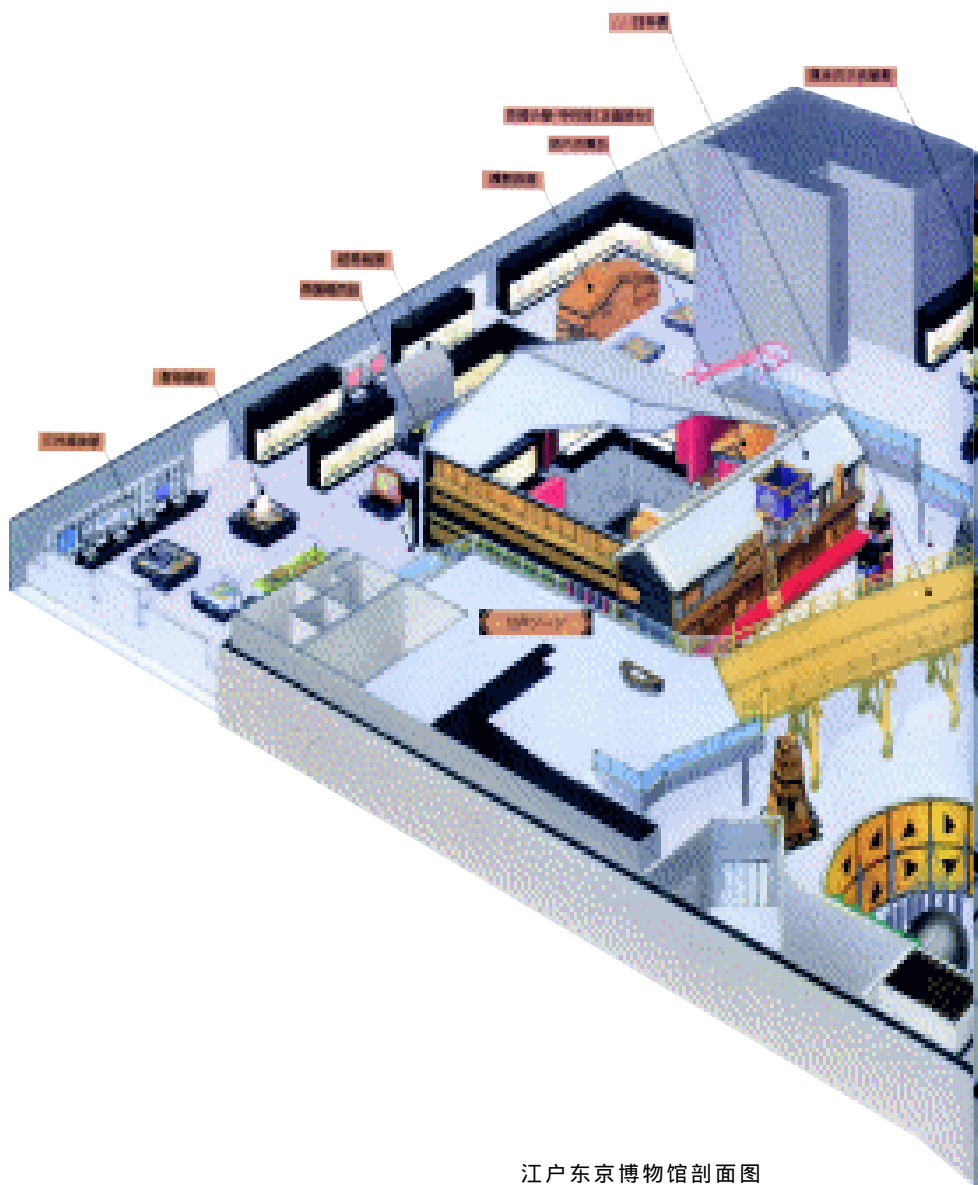
除了日常生活，我对江户历史与文化的了解，一半得益于博物馆，一半得益于墓地。

先从博物馆说起。东京可看的美术馆、博物馆很多，晚清来日的中国人已很有慨叹：同是学习西方，国人为何不大注重这些“没有围墙的学校”？即便是今天，日本人建立或参观博物馆的热情也仍在中国人之上。这似乎不能完全用经济发展状况来解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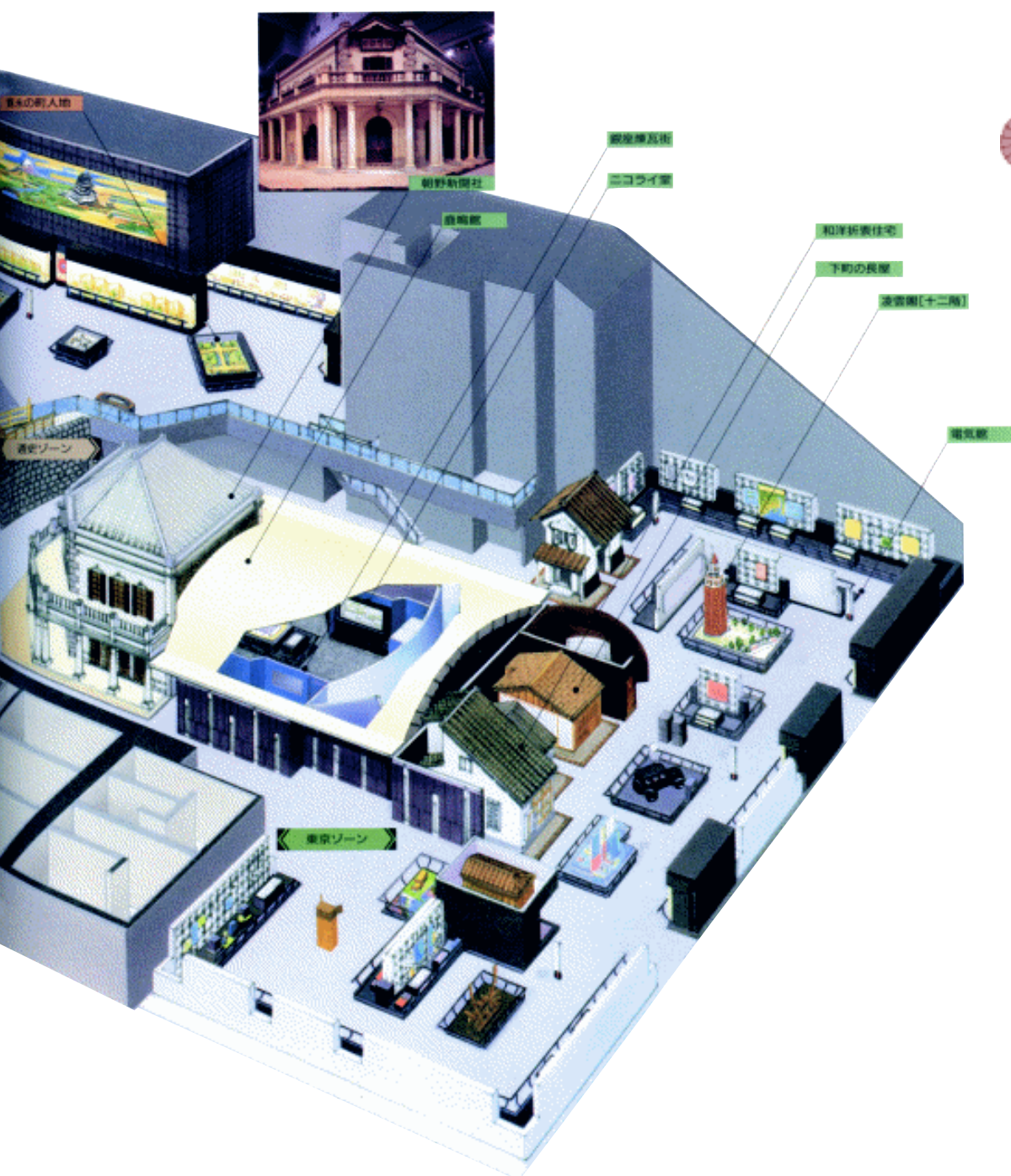
东京最让我留恋的博物馆，是位于隅田川畔两国桥边的“江户东京博物馆”。在寸土寸金的东京，腾出这么一大块地建造不能来钱的博物馆，这对于习惯精打细算的日本人来说，实在不容易。初见此将近两万平方米的江户东京广场，我的第一感觉竟是“过分奢侈”。四根巨大支柱支撑着船型大屋顶，并把博物馆分成上下两截。下面是放映厅、办公室以及举行特别展览的地方，上面则是收藏库、图书馆以及常设展览室。这是一个集展览与研究为一体的博物馆，不过从印刷精美、价格昂贵的“综合指南”看，其展示及撰稿，调动了一大批知名学者与作家。乘自动楼梯来到第六层，展现在眼前的是完全按江户时代复原的日本桥。桥两侧有山车、戏院、商店、民居、报社等实物或复制的模型五十多件，并借此分割成若干展区。像浮世绘、歌舞伎、产业革命、明治建筑等，虽也有相当出色的表现，但不如专业展览馆详细，且平日里不乏鉴赏的机会；最让我感兴趣的，一是都市的原型，一是市民的日常生活。

建筑是最能体现一个民族的生活理想及审美趣味的，可惜经过江户三大火事、关东大地震以及美军轰炸，目前东京城里，很难看到真正的“江户建筑”。每当面对精心保护的江户时代的残垣断壁时，脑海里总会浮现那百万人口的大都





江戸东京博物馆剖面图





市；可每一回的想像都不一样，而且场景支离破碎，无论如何组织不成一幅完整的画面。观赏着博物馆里众多的江户图屏风以及地图、模型，对照往日访古时自家的想像，十分有趣。偶然也有猜对的，但更多的是离谱的发挥——后者更让我和我的朋友开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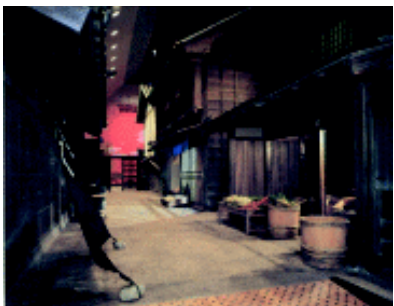
第五层是展览的主体，包括江户和东京两部分。我对江户救火的组织及工具、出版物的生产与流通、商店招牌的字体、市民的旅游路线等都很有兴趣。说实话，我对江户的了

解，尤其是日常生活方面的，主要得益于此博物馆以及“深川江户资料馆”。

后者也在隅田川边，不过不大好找，我们是倒了几次车，又问了几回路，方才如愿以偿。博物馆乃东京都所设，资

料馆则属于江东区——可这并不说明后者水平一定“降一级”。对于希望了解江户市民日常生活的人来说，后者或许更有用。按照历史资料，复原幕末深川佐贺町桥边的部分建筑，包括民居、商店、仓库、舂米屋、船宿、观火台，以及路边的柳树和茶水摊，俨然是一个完整的小社区。屋里生活设施（包括锅碗瓢盆、柴米油盐）一应俱全，参观者可以登堂入室，东摸摸，西看看。让观众坐在展品中，自由自在地生活，这比隔着玻璃瞭望亲切多了。明知不

《深川江户资料馆》



江户生活（《深川江户资料馆》）



可能真是一百五十年前的街道和房屋，但伫立其间，还是油然而生一种历史感。展览不大，但做得很认真，看得出是专家的手笔。相反，日光山附近的“日光江戸村”，名声和规模都很大，但一看就是“假古董”。走在熙熙攘攘的江戸村街上，看众多打扮整齐的假武士、假忍者、假艺妓、假水户黄门为你“装模作样”，三千日元的门票不能说太贵，可就是感觉没多大意思，还不如面对一块残碑自由想像时有趣。

东京的残碑大部分保留在寺庙的墓地里，那是我了解江戸历史文化的另一个好去处。冬日的午后，踏着残雪，在寂静的寺庙周围漫步，是我和妻子东京游的主要节目。平日总是事先阅读有关资料，设计游览路线，力求少走弯路。那天灵机一动，突然出击，说是去找当年章太炎借住并为鲁迅等人讲课的民报社遗址，顺便看看明治小说家尾崎红叶旧居迹。那一带是旧城区，街道东歪西斜，不大规整，再加上没有其他地方常见的旅游标志，居然让我们迷了路。走出东西线的神乐坂站，夫妇俩就开始闹别扭，“方向”、“路线”之争持久不懈。后来干脆响应政府的号召，也来个“不争论”，顺其自然，走到哪算哪，看到啥是啥。结果呢，想看的没看到，没想看的倒见到了。用中国的老话说，这叫“有意栽花花不发，无心插柳柳成荫”。回家一合计，一下午逛了三处名胜，全与江戸的风流人物有关。或许是苍天有灵，故意布下迷魂阵，将我们从“明治”引导向“江戸”也未可知。

在小巷里游荡，一边欣赏路边风景，一边互相埋怨。忽然感觉“有情况”，四周都是民房，何以留出大块空地，并且用围墙圈起来？仔细搜索，锈迹斑斑的铁门边立着牌子，原来是大名鼎鼎的国史迹“林氏墓地”。自林罗山以儒学佐德川家康建霸业以来，林家世代司幕府之学政，显赫非止一时。





一世罗山墓原在上野，三世凤冈时赐地于此，于是改葬。墓地里现有墓碑八十余基，一律儒葬，异于日本原有的墓葬方式。据说此地原是丘壑幽远，老树苍郁，想来风水不错。只是明治以后，儒学衰落，墓地也就日渐缩小，如今占地不过三四百平方米。墓地只在每年十一月初旬的“文化财保护周”时开放，平时参观必须提前申请。像我们这样的不速之客，只能从门缝和小窗窥探。这样也好，保留一点神秘感，也便于发挥想像力。树荫下光线不好，再加上没带望远镜，根本看不清墓碑的题辞。

江户前期数学家关孝和的墓碑同样看不清，不过那是另一种情况。离林氏墓地不远。有一座规模很小的净轮寺，寺里最有名的便是都史迹关孝和墓。关氏生于一六四二年，卒于一七〇八年，天文历算，莫不精通，时称“算圣”，撰著数十，门人数百。现有的墓碑虽说也古色古香，却是昭和三十三年（一九五八）复刻的。正面碑文与众不同，居然夹着“赠从四位时明治四十年十一月十五日”一行小字，显得不伦不类。其余三面刻着宽政年间撰写的墓志，可惜碑背贴着墙，根本无法识读。看看开头，再读读结尾，中间部分随游人自由发挥。如此理解，倒也别具一格。当初没想到这一步，还把立碑者狠狠嘲笑了一通，真是有失忠厚。

转到宗参寺时，天已渐黑，赶紧寻找山鹿之墓，那可是“国史迹”，不可不访。山鹿素行（一六二二——一六八五）乃江户前期著名的儒学家和兵学家，与后世武士道的崛起大有关系。碑文已经看不清了，只觉得墓前那对延宝年间的石灯笼古拙可爱，再就是所谓“乃木遗爱之梅”已经含苞待放。梅旁的木牌上写着，殉明治天皇的乃木大将，生前私淑素行，死后其门人将其喜爱的梅花移植于此。可乃木死去已经八十

多年，“老梅”为何竟如此纤细瘦弱？想来必是后世的好事者补栽。好古之心人多有之，只是不该如此含糊其辞。

一下午闲逛，居然邂逅江户前期儒学、数学、兵学三大名流，如此迷路，又有何妨？有了这一回经验，在东京访古，不再周密计划，而是更多“灵机一动”。当然，这么一来，也就不免多走些冤枉路，多花些车票钱。

不同于千年帝都北京，也不同于新兴商业中心上海，两百年前的江户，政治经济同步发展，雅俗文化日渐融合，其独特的魅力令我陶醉。离开东京前一天，和妻子专门乘地铁赶到浅草寺附近吾妻桥，在隅田公园呆了大半天。江水平静地流淌，夕阳下波光明灭，但与周围剑拔弩张的建筑物与霓虹灯相比，还是显得含蓄朴素多了。大概是阅历太多，隅田川不会轻易激动。唯其“含蓄”，才耐看，才能容纳古往今来无数骚人墨客痴男怨女金戈铁马，也才能留下无边无际的怀念与遐想。

一九九四年九月十三日傍晚完稿于蔚秀园。时感冒未愈，文思

困顿，如此短文竟写了五天，惭愧之至。

隅田川夜景





文学碑

东瀛访学，常常碰到这样的提问：中日两国文学的最大差异是什么？这样的问题其实无法回答，只是为了不让提问者太扫兴，偶尔也搪塞几句。比如说文学之有用与无用，便是一个可以即席发挥的话题。后来干脆避实就虚，就从不讲“文章救国”的日本反而大建“文学碑”说起。不懂比较文学，直到今天也没弄清什么是“最大差异”。不过，关于“文学碑”的感触却是真实的。

都说日本人讲实用、重功利，缺乏理论兴趣与超越意识，这话或许没错。可在日本旅游，观赏各种各样名目繁多的文学碑，你又隐隐约约感觉到其内心深处超越世俗生活的强烈愿望。自古以来，文学在日本基本上“无用”；但或许正是这种不大介入现实政治生活因而无用（相对于中国文人而

言)，使得文学保持某种独立性与超越性。世人对作家的推崇，除了一般意义上的名人崇拜外，还包含了对另一种更具审美意味的生活方式的向往。褒奖诗人，不排除附庸风雅或出于发展旅游业的考虑；但文学碑多而政治家的功德碑少，还是颇能说明一个民族的趣味的。



日本朋友说，立文学碑是从中国学来的，因为中国人将文章作为“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我很怀疑这种说法。在中国，有“文庙”（“庙”自然比“碑”更有气魄），但只属于孔子一人；有“文冢”（“冢”上不妨有“铭”），但那只是如唐人刘蜕“为文不忍弃其草，聚而封之也”。想来想去，找不到专为纪念诗人文学成就而立的碑。碑之为制，古已有之，颇受历代撰文、辨体者重视。明人徐师曾《文体明辨序说》中有一段话专讲“碑文”，值得一引：

后汉以来，作者渐盛，故有山川之碑，有城池之碑，有宫室之碑，有桥道之碑，有坛井之碑，有神庙之碑，有家庙之碑，有古迹之碑，有风土之碑，有灾祥之碑，有功德之碑，有墓道之碑，有寺观之碑，有托物之碑，皆因庸器（彝鼎之类）渐阙而后为之，所谓“以石代金，同乎不朽”者也。

如此琐碎的分类，尚且没有“文学之碑”。不知是中国的诗人过于自信，真的认定“纸墨之寿寿于金石”呢，还是“不朽之盛事”云云，乃文人之聊以自慰。为什么文人非托“古迹”，即因“功德”，方才能在碑林觅得立锥之地？真不明白中国人到底是否真的重视文学。

那么遍地“文学碑”的日本，文学就备受恩宠了吗？不



敢说。只是作为一个旅游者（惭愧得很，不敢冒充专家），文学碑的设立，为我的阅读日本文化提供了很多便利。每次出游，访碑便成了必不可少的项目。当时沉湎怀古，不曾认真考察文学碑的建制；等到落笔为文，眼前晃动的只是几个印象格外深刻的场景。就从这几个场景说起吧。

上大学那阵子，无产阶级文学吃香，小林多喜二（一九〇三——一九三三）是我阅读最多的日本作家。中文系的课程里，外国文学本就不太重要；轮到日本，就只剩下《源氏物语》和小林君了。那时候国门刚刚重新打开，外国文学译本不多，能找到的都读。何况小林的《蟹工船》、《在外地主》、《党生活者》等，还是课程规定的必读书。物换星移，如今的大学生当然不会再把小林当作日本文学的代表；只是偶尔听到有人用轻蔑的语气谈论小林君时，心里总是感觉不舒服。小林的文学成就不高，这我早就明白；让我敬佩的是其作为知识者的道德勇气。在我看来，日本无产阶级文学运动的功过，与小林君为反抗统治者压迫而献身，两者不是一回事。后者并不因为时世变迁而丧失其光辉。旅居东京时，曾到过拷打小林君致死的筑地警察署遗址凭吊。北海道之行，自然更少不了拜访小林就读并开始文学创作的小樽高等商业学校，因为听说那里有一块小林的文学碑。

从北海道的首府札幌乘快车到小樽，只需四十分钟。那是一个海港城市，面向日本海，明治十三年（一八八〇）开通日



小樽文学馆印章



小林和伊藤画像

本第三条铁路后，成为北海道开拓物资的集散地以及商业中心。当年曾经领尽风骚的银行街建筑以及运河边的石造仓库群，如今已成为观光者流连的历史遗迹。旅游指南上没有忘记提醒大家，后者正是《蟹工船》里所描写的制缶工场。客运码头边，有一家酒馆，干脆就叫做“蟹工船”。不管出于何种目的，小樽人毕竟没有忘记小林。小樽文学馆的印章上，镌刻的正是小林及其同学伊藤整的画像，展品也以这两位小说家的著述和生平为主。

向当地人打听小林文学碑，说是在山上，不大好找。只好包租一辆出租车（否则上得去下不来），

沿着山路，转到原小樽高等商业学校背后的山上。离文学碑几百米处停着好些汽车，不过与小林无关。那里有座展望台，是看小樽全景的最佳处，常有游客光临。也幸亏冷清，文学碑显得庄严肃穆。绛红色石头砌成五六米高的两面墙，像是一本打开的大书，也像紧闭着的监狱大门。左边自上而下依次是小林头像、碑名及题辞，右边则在方形洞中嵌着青铜头像，一脸刚毅，大概象征着无产者。初夏时节的小樽，太阳不晒，碑后的白桦林嫩黄中夹着雪白，空气中弥漫着海腥味。坐在碑前，眺望远处碧蓝的日本海，遥想半个多世纪前，从这里走过的文学青年。

司机告知，收费以小时计，还有剩余时间可以访问石川啄木（一八八六——一九一二）歌碑。短命的天才诗人啄木，曾在北海道流浪一年，如今小樽、札幌、函馆等地都有其歌碑，与其生前的穷愁潦倒形成了鲜明的对照。歌碑立在另一座山头的小樽公园里，大意是：



小樽是座悲伤的城市，小樽人的歌声苍凉忧郁。



76

与小林碑的寂寞截然不同，啄木碑前围着大群少女，正怀着甜甜的忧伤，摆着各种姿势照像。

访小林文学碑是蓄谋已久，对可能出现的各种情景都有心理准备，包括“门前冷落车马稀”之尴尬，都在意料中。这样的访古，“也无风雨也无晴”，基本上是圆梦或还愿。我更喜欢意外的“发现”，突然间面对一块你不大熟悉的作家的文学碑，需要调动一切积累，并向周围的朋友请教，那既是怀古，也长知识。所谓寓学于游，借访碑了解日本文化，主要指的正是这种场面。但这样有趣味、有性灵、有情致的机会其实不太多，要不作家太生僻，引不起兴致；要不碑太俗，无法产生美感。对于访古的人来说，碑的年代几乎与其价值成正比。而我却竟被荒山野岭上一块刚建的新碑迷住了，说来也是“有缘千里来相会”。

还是先从我与幸田露伴（一八六七——一九四七）的“缘份”说起。在东京大学和京都大学演讲，曾谈及现代人的“文”、“学”分离。日本朋友告知，在日本，最后一位学识渊博的大作家是曾任教京大的幸田露伴。此前，曾在神保町买到大正四年出版的露伴等人讲述的《新论语》，赶快取出拜读。露伴受过系统的日本古典及汉学教育，其小说《风流佛像》、《五层塔》中刚强执拗的男主人公，与其说是张扬近代西方的个人主义，不如说是混合儒佛以及武士道的“大彻悟”。《新论语》中露伴训解的是“为政”、“八佾”两章，看他发挥孔夫子“五十而知天命”、“温故而知新”、“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等名言，实在有趣。不过也就是翻翻而已。对于露伴，我基本是既不“学”也无“思”。

那天与朋友开车游日光山，黄昏时候，来到栃木县与群馬县交界处、海拔二千米的金精岭。此地高寒，因冬季积雪而封闭的国道刚刚开通，路两边残余的雪堆有一人高。正赞叹着雪尚未化尽而墨绿的唐松已生气盎然，忽见冷寂的路边矗立着一座纪念碑，赶忙停车观赏。约四米高两米宽的原生石上刻着“幸田露伴文学碑”几个大字，下面是一段文章的摘录。读了碑背的说明文字，方知明治二十二年（一八八九）露伴由日光经此地，写作了充满奇异幻想的小说《对髑髅》。片品村教育委员会于小说诞生百年之际，立碑纪念。此碑已立四年多，以日本资讯之发达，手中刚出版的旅游指南不该漏记，不知是否因立碑者“级别不够”。别人感觉如何不得而知，我对这块碑很有好感。立意及制作工艺均不错。更因其独立天地间，山色苍茫中自有一种大度与尊严，更使得荒无人烟的群山峻岭顿添生气。立碑者在旁边还辟出一片空地，让匆匆开车赶路的过客得以从容休息；至于能否领悟露伴文学的意境与情趣，那就得看个人的悟性和修行了。

除了专门为某一作家或某一作品立碑，还有在名胜古迹，选择与其相关的诗文片段立碑。这种文学碑数量甚多，不少变成高级的“景点说明”，不大有趣。但也有相得益彰者，比如东京净闲寺里的永井荷风诗碑。

永井荷风（一八七九——一九五九）是周作人最喜欢的日本作家，其《荷风随笔》、《东京散策记》、《江户艺术论》等经常出现在知堂文章里。我对荷风了解不多，除了“一种风流吾最爱，南朝人物晚唐诗”过目不忘，再就是他对浮世绘的赞叹，对已经逝去的江户风情的迷恋，对花街柳巷的兴趣——后两者促成了《隅田川》、《墨东绮谈》这两部名著的创作。此次东游，颇醉心于江户的流风余韵，多少次徘徊于隅田川边。





但我心里非常明白，“往日风流”不可能再现，所谓的“乡土艺术”，很容易演变成旅游纪念品。

东京保留了不少真真假假的江户遗迹，唯一不

能恢复的是“游廓”。昔日骚人墨客寻欢作乐的柳桥、新桥和吉原，是江户作为繁华大都市不可或缺的场景。尤其是一六五七年开设的新吉原，是幕府公认的唯一“游廓”，最盛时游女超过三千。三轮桥附近的净闲寺，葬有江户时代之游女两万余人，故谚曰：“生在苦界中，死于净闲寺。”

说不清是出于旅游者的好奇，还是喜谈风月乃文人习气，晚清以后来日的中国文人，像王韬那样终日寻花的固然不多，但在诗文中故意牵涉一点异国青楼的却不少。自一九五八年禁止卖春法实施，结束了新吉原三百年繁华梦，到此一游的雅士也就难得一见。如今的吉原，起码从外表上看不出任何特异之处。我访吉原那天，首先拜访的是净闲寺；倒不是有何深意，就因为这样走起来路顺。寺庙在重修，大门紧闭，但游客可从旁门出入。在临时搭起的工棚边转来转去，终于绕到寺后的墓地。墓地不大，周围是郁郁葱葱的树木，加上细雨濛濛，陡然让你觉得阴森森的。墓地中间是总灵塔，基部就刻着上引的谚语。一米多高的台基上，石莲花托着墓



廓中东云（安藤广重绘，
《名所江户百景》）



江户新吉原图（歌川国贞
绘，《江户东京博物馆》）



新吉原总灵塔

碑，上刻“新吉原总灵塔”六字。塔前香烟袅袅，游人奉献的鲜花已经枯萎，只有慰灵的长木排不怕风雨，仍傲然屹立。

引起我极大兴趣的，是总灵塔对面立着永井荷风的诗碑和笔冢。诗录自《偏奇馆吟草》中的《震灾》，并非专为此寺而作。据说荷风生前喜欢造访净闲寺，哀悼死去的游女。自留学归来着意寻求“江户趣味”，荷风经常出入青楼，且与艺妓结婚，离婚，自是最有资格为游女写悼亡诗者。日本文人历来不太“道学”，再加上江户游戏文学的传统，置荷风诗及像于此，想来本人不会尴尬，游客也觉得“当之无愧”。

一九九四年九月七日于蔚秀园

【附记】

文章早就写完，一直压在箱底，不想拿出来发表，就因为述及露伴的文学碑时语焉不详。手头只有当初游览时拍的录像，碑文一扫而过，无法释读。来访的芦田君自告奋勇，回日本后给片品村教育委员会打电话，方才明白碑的正面刻着《对髑髅》开篇的几句话。现抄录碑文大意如下：

俗话说，出门靠旅伴，处世靠人情，然而我却从不知道那样的滋味。有一位仁慈的女人，给我述说了她的身世。但是，她所说的故事，显得有些可怕，也有些神奇。





西乡铜像

到过东京的人，很少不游上野公园；游上野公园的人，很少不瞻仰西乡铜像。引起我对这座铜像的兴趣的，并非其雕塑艺术，而是日本人对西乡隆盛的评价，

春夏秋冬，阴晴圆缺，徘徊于西乡铜像之下，观察游人的神情，至今未见抗议或深表怀疑者。想来大多数日本人都同意碑文的意见，视西乡为“伟人”。至于其明治十年之举兵反叛，碑文和旅游指南上都用隐晦的语言一笔带过。可我到过熊本城，也阅读



上野清水堂不忍池
(安藤广重绘,《名所
江戸百景》)



上野公园的
西乡铜像

了不少关于西南战役的资料，略为了解这日本历史上最后一次大规模内战之惨烈。有趣的是，官方和民间至今没有为“叛乱”平反，可又努力为其首领西乡隆盛开脱责任。西乡兵败自杀后十二年，明治天皇追赠正三位；又过了四年，两万五千人集金修西乡铜像。令我感慨不已的是，日本人对其“开国元勋”兼“叛军首领”的态度竟如此豁达——当然也可以说“暧昧”。

相对来说，中国人对西乡的态度，先贬后褒，从来都是立场坚定。闲来翻阅有关资料，隐隐约约感觉到，这种差异很可能正体现了中、日两国文化的不同。

戴季陶的名著《日本论》中，有一段话专论西乡隆盛，对其“人格”的历史作用推崇备至：

我们试把日本这几十年的历史通看起来，西乡隆盛失败了，然而他的人格，化成了日本民族最近五十年的绝对支配者。各种事业的进行，都靠着他的人格来推进。

戴乃“日本通”，此书又成于本世纪二十年代，对西乡如此赞扬一点也不稀奇。其实，在晚清的维新派或革命派的诗文中，西乡早就平反；用章太炎的话来说，是条铁骨铮铮的好汉。那时的中国人，关注的是明治维新，对西南战役知之不多或根本不想知道。既然铜像已经矗立，中国人自然随着日本的舆论转向。要了解中国人对“功臣”举兵“反叛”这





一事件的真实感受，必须到铜像建立前在日中国人的诗文集 西南战争图（矢田一嘯绘）中寻找。

说来真是巧合，西乡举兵那一年（一八七七），中国派出了第一任出使日本大臣，其行程还因为战事略为耽搁。正是这位大使先生，在《使东述略》中，为我们留下了中国人对西乡反叛的最初印象：

寇首西乡隆盛者，萨人也，刚狠好兵。废藩时，以勤王功擢陆军大将。台番之役，西乡实主其谋。役罢，议攻高丽，执政抑之。去官归萨，设私学，招致群不逞之徒。今春，以减赋锄奸为名，倡乱鹿儿岛，九州骚然。日本悉海陆军赴讨，阅八月始平其难，费币至五千万。顷国主下令减租，其事甚美。

这段话很符合何如璋这位翰林公兼钦差大臣的身份及其知识背景。骂“寇首”，斥“好兵”，赞“减租”，句句都是深明大义的儒生该说且能说的话。至于事件的叙述，大致不差，资料来源很可能是当地的华侨。其时何氏尚在长崎，未与当地官府接触，理由是“使者入境，未递国书，不便私见”。我对平乱“费币至五千万”一句尤感兴趣，想来叙述者和听讲者都对这条显然是官方公布的消息颇觉新奇。

笔者也有这种经验。第一次见到接待某国总统共花去多少日元的报道，是在东京开往京都的新干线上，记得那一瞬

间我的惊愕。中国人更习惯于算无法用数目字表达的“政治账”，而不屑于如此“斤斤计较”。比如，不管是清代的邸报，还是今天的《人民日报》，都没有告诉纳税人政府首脑外事活动的费用，也没有公布过甲午海战或者抗美援朝共花了多少钱。



不知是那时的大使文化修养高呢，还是公务不太繁忙，《使东述略》外，何如璋还撰有《使东杂咏》。其中咏及西乡，仍是义正辞严：

征韩拂议逆心生，隅负真同蜗角争。

壮士三千轻一死，鹿儿岛漫比田横。

唯一让诗人感觉困惑的是，何以此等“贼人”，也讲“忠义”，居然“败时，其党人千人死焉”。

何大使上任两年后，大名士王韬游东京。主人出示鹿儿岛战图，观西乡排阵结垒之法，王氏则大讲“顺逆之势殊”，故贼军不敌王师：“呜呼！天下之梟雄渠帅，昧于大义，躬为叛逆，安有不底于亡哉！”幸亏那时的日本人不大晓得王韬君曾上书太平天国，否则怎么向人家解释，为何从“逆子”转为“顺民”？或许上书时太平天国已成气候，大有新桃换旧符之势，故不算“叛逆”。若如是，则只有成败，而无所谓顺逆；西乡的过失，只在于打了败仗。

那时的东京，“西乡”是个热门话题。不断有人出示有关西乡的文物；王韬也就不断发表严正而又迂阔的评论。翻阅《扶桑游记》中此类不着边际的“高论”，你会觉得中国的读书人除了“深明大义”，没什么别的见识。后人单读王韬的游记，也能感觉到其时的日本人对西乡的态度相当复杂；而

王氏不屑于去理解其中奥秘，只顾顺着原来的思路作长歌：

功高赏薄寻常耳，何不角巾归闾里？

坐令一死鸿毛轻，昭代宏勋等流水。

直到有一天应谷干城中将之招，读其诗，听其言，王韬才略有所思。谷干城乃当年决战时官军的主将，重修的熊本城里建有其塑像。按中国人的思路，敌对双方应是不共戴天，没想到谷君言谈之间，对西乡不但没有辱骂，反而颇多敬畏：



谷干城

中将曾有诗咏西乡云：“枉抗王师不顾身，多年功绩委风尘。怜君末路违初志，春雨春风恨更新。”此吊西乡之功而叹其不终，二十八字中，有无限感慨。闻之日人，西乡亦足为近代枭雄，维新之建，多资指臂；其晚节末路，倒行逆施，盖有其不得已者。故论者略其迹而原其心，朝廷亦追念前功，不加深究。

这段话非常重要，起码让我们知道，战事刚刚结束，京城中已有不少为西乡开脱的言论。就连现任军事首领，对叛军头目也颇多同情。也许正是这种“民心”，使得政府必须用某种办法为西乡平反——建铜像而不谈论西南战役，应该说是一着高招。可惜王韬从谷干城诗中，只读出政府的宽宏大量，因而其和诗仍是“忠臣贼子”黑白分明。

随何如璋出使日本并在东京与王韬结为莫逆的黄遵宪，其《人境庐诗草》中也多处提及西乡隆盛。最引人注目的当属《西乡星歌》，一改何、王讨逆之高调，将西乡作为生不逢时的大英雄来歌咏。此长歌开篇奇崛，顿生满纸风云之气：



人不能容此嶷崎磊落之身，天尚与之发扬蹈厉之精神。
除旧布新识君意，烂烂一星光照人。

诗前有小引，说明呼彗星为西乡星，乃日人传说；可据《左传》“彗所以除旧布新也”来“识君意”，明显有为日后西乡的举兵反叛开脱之意，与王韬所复述的“略其迹而原其心”之说相通。长歌的最后四句，更是直接为西乡这位失败的大英雄招魂：

英雄万事期一快，不复区区计成败。
长星劝汝酒一杯，一世之雄旷世才。

这么说来，国人也有不囿于“忠臣逆子”之成说者。但先别高兴，现在通行的《人境庐诗草》中，此歌虽与其他在日所吟诗编在一处，却系晚年归乡后补作。

黄君虽好学深思，初渡扶桑，其实也不理解日本人对待“叛军首领”西乡隆盛的态度为何如此“暧昧”。明治十五年（一八八二），宫岛诚一郎刊行有何如璋、黄遵宪等人作序的《养浩堂诗集》。出于对黄氏的尊敬，诗集中附有其零星评语，其中涉及西乡一则耐人寻味。宫岛在西乡举兵前曾和其诗，称颂其“高尚之志”，末语为：“若使此心长爱国，江湖何与庙堂殊？”西乡兵败自杀，宫岛刊行集子时居然不删不改；倒

是黄遵宪看不过去，出来“主持正义”：



86

西乡此种人，岂能老田间者。其叛也，愤爵不平，英雄技痒耳。其人但欲取快一己，无所谓爱国。

从王韬的“功高赏薄”，到黄遵宪的“愤爵不平”，都是将西乡举兵归结于个人恩怨。凭我阅读《西乡南洲遗训》及其诗集的经验，这种说法似乎很难成立。引两首西乡所吟汉诗，以见其志向之高大。两首都《失题》，前者见其王学根基，后者则是生平自述：

学文无主等痴人，认得天心志气振。
百派纷纭乱如线，千秋不动一声仁。

几历辛酸志始坚，丈夫玉碎愧砖全。
一家遗事人知否，不为儿孙买美田。

这种理想型的政治家，自然也可能有许多毛病，但所争不会只是爵位。时人之所以“略其迹而原其心”，大概也正是基于这种想法，不愿意相信西乡会为了个人功名而不惜生灵涂炭。

但是，不管敬惜西乡的人如何借“原其心”为其辩解，西南战役事实上不能不使得“生灵涂炭”。面对这种残酷的现实，当年日本第一流的知识者是如何思考的？这种思考又如何影响大众对西乡的评价？这都是很有趣的问题，可惜我没有能力解答，只能在非常有限的阅读范围内，挑选几条史料

作为思考的线索。

东京人对西乡隆盛多有好感，很可能是念及其对“江户无血开城”的贡献。今日东京有不少名胜，专门纪念东征军参谋西乡隆盛与幕府陆军总裁胜海舟的这一历史性会见。胜氏也因此成为西乡的莫逆之交，并在其战死两年后，为其立诗碑于净光寺。此诗碑据说至今仍在，可惜我没能访到。倒是在《西乡南洲遗训》的附录里，读到一首胜海舟咏西乡的五古，后半截可作为前引“略其迹而原其心”一说的最佳注脚：

只道自居正，岂意紊国纪？

不图遭世变，甘受贼名誉。

笑掷此残骸，以付数弟子。

毁誉皆皮相，谁能察微旨？

唯有精灵在，千载存知己。

先以“岂意”开脱，后有“微旨”垫底，即便“紊国纪”，也都情有可原。不只是西乡不以世人之“毁誉”为意，诗人似乎也更看重此“千载存知己”。与中国人讲政治立场，动不动“大义灭亲”不同，胜海舟以及上述的谷干城、宫岛诚一郎都不避嫌疑，甚至有意渲染其与“叛军首领”西乡的友情。将“政见”与“友情”分开，更注重“心情的纯粹性”，而不是政治舞台上的“姿态”，这种价值观念使得西乡兵败后能够很快恢复名誉。

“甘受贼名誉”，既写西乡之独立不惧，也隐约透出诗人对世人诬之以“贼名”的不满。这倒使我想起另一位明治思想家西村茂树对“朝敌”与“贼”的区分。西村的《贼说》发





表于西乡“谋反”前两年，本与此事无关；但用来说明西乡身后遭遇，似乎很合适。西村主要论述日本古来称与天子争权威或与政府为敌者为“朝敌”，后世接受中国影响，方才给政敌冠以“贼”名。在西村看来，杀人越货为民祸患者方可称为“贼”，至于“朝敌”，只是说明其站在政府的对立面，本身并不构成道德评判。若以“朝敌”为“贼”，则等于赋予政府绝对权威，拒绝任何来自民间的批评乃至挑战。很长时间内，西村的“贼说”没有能够成为大多数日本人的常识；但知识分子开始考虑朝野间道德资源的分配，这总比只是抱怨“胜者为王，败者为寇”好些——后者实际上是对“权力”独占“价值”的默认。

没有材料说明胜海舟等人是否接受了西村的“贼说”，不过不把与政府为敌的西乡视为“贼”，却是确凿无疑的。或许更能说明明治时代知识者思考深度的，是福泽谕吉对大义名分论的批判。西南战役硝烟未散，福泽撰写《丁丑公论》，直接针对的正是时人之以“国贼”骂西乡。福泽强调，“忠诚”与“叛逆”并不具有先天的绝对价值，若以政府权威不可侵犯为第一准则，则明治维新建立起来的新政权也属非法。应是否“推进人民之幸福”为标准，衡量西乡之举兵，而不能只是斥责其反叛政府。福泽断定今日之大骂“逆贼”者，假如西乡成功，必定反过来为其高唱赞歌。说到底，“今日的所谓大义名分，无非只是默然顺从政府而已”（参阅丸山真男《忠诚与叛逆》一文）。

福泽一生在野，着力于国民教育以及思想文化建设，政治上既非“政府派”，也非“反政府”，更不是左右逢源的“骑墙”。明治初年，日本举国上下奋发图强，舆论界一片叫好声。福泽则对引进西洋文明、发展市场经济过程中“廉耻节

义”之丧失，“抵抗精神”之日渐衰颓，以及“人民独立风气”之未能养成深为忧虑。反过来，像西乡那样具有独立精神且坚韧不拔的理想主义者，确实值得钦佩。从发扬“民气”，拯救“士魂”角度，福泽甚至希望“出现第二个西乡”。

将“民气”与“士魂”的养成，置于一时一地政治决策之上，这才能理解日本人为何对西乡要“略其迹而原其心”。政治上之是非得失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民族魂”的建设与守护。就在上野公园西乡铜像的旁边，还有一座香火很盛的彰义队墓所，那是为纪念一八六八年上野之役中抵抗官军而死的彰义队勇士所建。在东京访古，经常见到江户无血开城的纪念物，可也有不少血战东征军的彰义队墓所。在日本人看来，两种截然不同的选择都有其合理性。末代将军德川庆喜的隐退，以及为避免生灵涂炭而下令放弃抵抗，乃是顺应历史潮流；而武士们不听约束，在大势已去的状态下“以卵击石”，为注定灭亡的幕府奉献其最后的忠诚，乃是坚守三河武士精神，两者同样值得尊敬。这种思路对于擅长分“顺逆”、辨“正邪”、讲究“大义名分”、主张“路线决定一切”的中国人来说，似乎有点陌生。

一九九四年八月十七日于京西蔚秀园

【附记】

据柳田国男称，在日本，作为个人而享受祭祀，除了德高望重，还必须是悲剧性死亡。而新政权为与政敌实现某种程度的和解，有必要通过祭祀的方式，安抚失败者的亡灵——也可以从这一角度解读西乡铜像。





开国纪念

在日本各地旅游，经常可以看见有关开国的纪念物。日本人说“开国”，并非指某一政权的建立，而是从此前的锁国状态中挣脱出来，加入国际社会。具体措施是通过与欧美各国签订条约，开港开市。德川幕府的锁国令始于一六三三年，主要目的是禁止基督教的传播以及由政府垄断情报和贸易。即使在锁国状态下，长崎仍对通信或通商的朝鲜、琉球、中国和荷兰开放；因此，那里遍地皆是的“西洋风景”，其实与开国关系不大。倒是神户的异人馆、名古屋的明治村、横浜的开港资料馆，以及位于伊豆半岛的豆州下田乡土资料馆，



异人馆



佩里

在在提醒你日本人对“开国”这一事件强烈而持久的兴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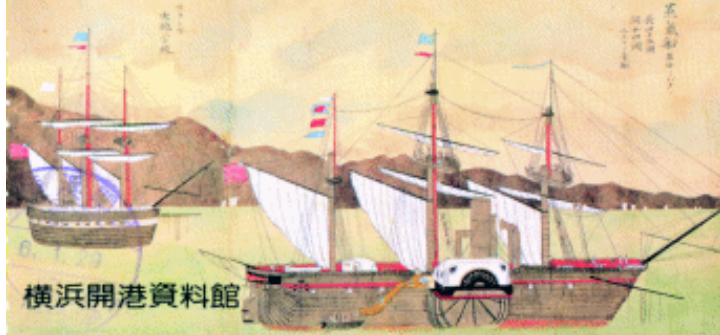
日本人讲起开国，眉飞色舞，似乎因其明治维新的成功而忘记了当初的屈辱，甚至对佩里（M .C .Perry）率军舰来航感恩戴德；而中国人提及帝国主义入侵，则咬牙切齿，只有虎门禁烟、三元里抗英，无所谓“开国纪念”。上世纪中叶，中日两国开始各自直面西方列强的挑战，其间策略有异，效果不同，一直是专家学者研究的重大课题；但一般民众心目中的开国形象，竟然如此截然相反，

确实发人深思。

虽说同是内忧外患，同是被迫开港，可中日两国历史与现状其实大有差异。表面上都是闭关，日本的锁国以入国的统制为主，中国的海禁则主要是出口的统制；都有强烈的民族自尊，但近世山鹿素行、本居宣长等人提倡的日本主义，根本不能与古已有之的华夏中心意识相提并论；都面临西方列强的巨大压力，日本只是黑船的阴影，中国则是实际战争以及随之而来的割地赔款；都依靠自身的努力而没有沦为殖民地，日本因明治维新而逐渐跻身世界经济强国，中国则历经同治中兴、戊戌变法、辛亥革命等一系列政治风浪，经济发展始终不如人愿。但所有这些，都还不能解释何以两种开国观的差异竟如此之大。

异人馆与明治村都是洋化狂潮形成以后的作品，虽也精彩，但没有出乎意料之外的地方；我对幕末日本人如何接纳强大的西方感兴趣，因而也就对两个“门前冷落车马稀”的资料馆更有好感。





横浜开港资料馆

冬日的下午，踏着积雪，和尾崎君漫步在横滨街头，指着马车道和日本大道两旁残留的明治建筑，品味着一百多年前“文明开化”的流风余韵。横滨以开港而发展，也以开港而名扬天下。因此，游横滨不能不看开港纪念馆，开港广场和开港资料馆，其中最值得留连的还是资料馆。这幢风格典雅的灰楼，建于一九三一年，原是英国领事馆。中庭的玉兰树，据说是江户时代的“老住户”，曾目睹一八五四年日美和亲条约的签订。此“历史见证人”的主干焚于关东大地震，现在见到的是残根长出来的新芽。

馆里收藏开港及横滨城市发展的资料十多万件，最吸引我的是各种有关“黑船来航”的绘卷。一八五三年七月八日下午五时，美国人佩里率领东印度舰队四艘涂成黑色的军舰，抵达浦贺的海面，从此揭开了日本史新的一页。我感兴趣的不是幕府或勤王志士的态度，而是被“船坚炮利”惊呆了的普通日本人，是如何表达他们的见解。绘卷里的“黑船”威风凛凛，没有丝毫丑化的嫌疑，想来画师落笔时充满兴奋与好奇。这还不算，画面上的每艘船都注明船号、长度和宽度，以及所载大炮数目。不像是出于军事目的，而是日本人普遍重实用，对奇器、奇术感兴趣，才能创作并欣赏此等“正邪不分”的画卷。据说，《望厦条约》签字后，中国代表以仁义之师不需利器为由，拒绝对方赠送的火炮模型和军事书籍；而据目睹日本开国的罗森记载，日美签约后，幕府代表愉快地接受了电



黑船

话、照像机等各种“奇技淫巧”。中日两国对待形而下的器物以及异文化的不同态度，直接影响了其开国的进程。

为纪念横滨与上海结成友好城市二十周年，资料馆里正举行“横滨与上海——两个开港城市的近代”专题展览，这正是我们此行的主要目的。展览由两国学者共同操办，其中数上海档案馆、上海历史博物馆藏品多质量高。可惜都市研究非我所长，港湾设施、贸易关税、产业展开等专业性问题，明知十分重要，也只能“外行看热闹”。还是“横滨居留地与上海租界”、“文化与情报”、“横滨与上海之风俗”等，更接近我的趣味和知识背景。



横滨与上海

作为非专业的读者，徘徊展厅，接受的并非专家所构建的“完整的历史”，而是一堆“文明的碎片”，以及若干相当个人性的奇怪联想。比如，一八九九年，也就是戊戌变法失败后的第二年，就在日本政府借修改条约而取消横滨居留地的同时，上海租界大扩张，并设置独立的行政机构。在此之前，日本政府始终没有放弃居留地的行政权，这与中国租界之形成独立王国大不一样。或许正因为日本人在居留地问题上所感受到的屈辱不太明显，事过境迁，便主要将其作为“西方文明的窗口”来看待。

自认“苦大仇深”的中国人则没有那么大度，很难忘记曾经遭受的巨大创痛。一九〇三年《苏报》案中，章太炎因公使团拒绝将其引渡给清政府而得以从轻发落；可章氏并不领情，称此为外人争租界权力，与他的革命宗旨毫无关系（《狱中答 新闻报》）。一九〇四年梁启超撰《治外法权与国民思想能力之关系》，许租界为“新思想输入之孔道”：“取数千年来思想界之束缚，以极短之日月而破坏之解放之，其食



此诸地之赐者，不可谓不多也”；同时也指出，此种租借来的自由削弱了“中国志士”的意志与能力。长期以来，国人只从帝国主义强权以及中华民族的屈辱这一特定角度来解读租界，思路远比章、梁等晚清学者狭隘。近年学界开始转向，认真探讨租界在中国现代史上的复杂作用。但愿不要一转就转过了头，将其改写成今日的“经济特区”或时尚的“国际交流”。

展品中最吸引我的，一是桃花坞木刻年画《上海四马路洋场胜景图》，一是比果的讽刺画《发展之路》。前者的魅力，与其说来自中国年画特有的线条与色彩，不如说来自风俗画家对人情世态的敏感。面对四马路上拥挤的马车、人力车、自行车、双人脚踏车、独轮车，以及悠闲的行人和威风的轿子，瞬间的感觉是，此画面比史家的千言万语，更直接地使我回到那个华洋杂处古今并列的年代。说实话，以前看不起各种各样的“胜景图”，总以为未免太俗气，远不如文人画韵味深长。在阅读日本的过程中，逐渐由“东京”进入“江户”，这其间安藤广重等人的“胜景图”起了很大的作用。此类风俗画对于文化史研究的意义，似乎目前还没有引起中国学界的充分重视。

比果是一八八二年来日的法国画家，其发表于一八八八年的《发展之路》，简直就像一则预言。画面右边是一着西装骑自行车的日本人，自称已经不再是亚洲人了；左边瓜皮帽下露出长辫子的中国人，正悠闲地说着风凉话：看他走得那么急，准得摔跤。后来的历史证明，急于脱亚入欧的日本人果然摔了一大跤，而只会说风凉话的中国人则再也悠闲不下去。当初的讽刺本就双方互相指涉，可惜身在其中者，往往只读出对方的可笑。

如今，中日两国政治、经济状况不同，但在谋求“发展”这一点上却是一致的；换句话说，都急匆匆走在“发展之路”上。一百多年前的中国人，因对“发展”缺乏足够的热情而受到历史的惩罚；今非昔比，“发展”已经成了十二亿中国人最大乃至唯一的目标。对经济增长的期待，对现代化的迷信，对所谓“东方的崛起”的二十一世纪的向往，使得今日中国，对“发展”带来的正面、负面的效果，普遍缺乏认真的反省，陷入一种近乎盲目的乐观。但愿，这只是杞人忧天。

一八五四年二月十一日，黑船再度来到江户湾。三月三十一日日美签约，开辟下田和箱馆两港。四月十五日佩里乘旗舰波瓦坦号来到下田，六月签订补充条约后方才率舰队离开。至此，日本开国已成定局。

一个半世纪后，车过下田港，朋友指点着屹立海岸的佩里铜像以及上陆纪念碑。走进下田市里规模不大却很有特色的乡土资料馆，手里的门票是当年的浮世绘“黑船波瓦坦号下田入港图”。随同佩里第二次来航的，有一位名为罗森的中国人。其记录此行的《日本日记》，初刊于一八五四年《遐迩

黑船波瓦坦号下田入港图





贯珍》，十年前因收入“走向世界丛书”而广为人知。重刊本附有一罗森像，是从江户时代著名画工锹形赤子的《米利坚人应接之图》中复制的。资料馆里也陈列着一幅复制的和画罗森像，上题“罗森在下田町徘徊询问物价高低图”。画面上瓜皮帽长辫子的罗森，一手撑黑雨伞，一手持红包袱。此画没有注明绘制年代，看来并非近年补绘，可也不像当场写真。此罗森多了一把胡子，画面的色彩对比那么强烈，再加上“询问物价高低”的说法，更像是事后根据有关资料追忆而成。《日本日记》中有一段话，自述下田购物，很可能正是此画所本：

步至海旁，多见大鲍鱼，是下田之土产也。回于町店买物，则以漆器、瓷器为佳。所拣物品，则书名于物上，记价，然后店人送到御用所，交价于官。

罗森生平至今不详，但从日记中少记政治大事而多记土产物价，可以想像其商人身份。从外交场合的罗森走到询问物价的罗森，中间应该有学者的考证研究。正因为后者的判断更准确，非当年千方百计请求和诗题扇（一月之间应邀题扇五百余柄）的日本人所能想像，故断为“事后追忆”。

资料馆里收集、陈列六幅早期的佩里画像，还有一幅以供对照的相片，让人大开眼界。浮世绘画家根据自己的想像，来为其时“如雷贯耳”的佩里总督立像。有画成妖魔鬼怪的，有画成日本传说中的天狗的，有画成中国将军的，也有画成西乡隆盛的；但很快地，佩里的特征逐渐显示出来。可以将此作为日本人接受外来文化的“寓言”来阅读；同样需要经历一个以自己的经验（或称“期待视野”）来“误读”外来文化、并在此后的“对话”中不断自我修正的过程，日本人的

长处只是在于尽量缩短这个“过程”。

熟悉赛金花故事的，肯定会对下田的阿吉大感兴趣。一八五六年，根据日美和亲条约，美国在下田的玉泉寺开设了最初的领事馆。第二年，为了使得“孤独”的哈里斯总领事能更好地工作，十六岁的阿吉被迫离别恋人而走入领事馆。两年后阿吉出走，在同胞的嘲笑声中四处流浪；四十五岁时贫病交加沦为乞丐，四十八岁时投水自尽。据



阿吉

说在其投水处，现在立有碑记和供养菩萨，成了旅游景点。如今的阿吉，已是文学家以及平民百姓茶余酒后的绝好话题。念及此，我连前往凭吊的勇气都没有了。

资料馆里还有吉田松阴、佐久间象山、德川庆喜等人的纪念文物，比起这些影响日本开国进程的伟人来，阿吉实在太渺小了。可不知为什么，走在夕阳下的下田街道，眼前晃动着一帧帧褪色的旧照片，一个哀怨沉默的少女侧影，始终叠映在照片的右上角，让我再也没有兴致观赏周围的风景。



吉田松阴

一九九四年九月二十六日中午于京西蔚秀园





“教育第一”

晚清旅日的中国人，不管是官员还是学者，都对日本的教育赞不绝口。一九〇二年，吴汝纶在接任京师大学堂总教习之前，专程赴日考察学务；可吴氏尚未归来，《钦定学堂章程》已经颁发，而章程又明显受日本学制影响。也就是说，不待政府专门派人考察，国人对日本教育的了解已经相当充分。

其实，早在戊戌变法时，康有为便提出“远法德国，近采日本，以定学制”的教育改革思路（《请开学校折》）；梁启超拟《京师大学堂章程》时，更明言“略取日本学规，参以本国情形草定”（《戊戌政变记》）。日本教育对中国近代学制的形成起了巨大作用，这一点已属常识。问题是当时的中国人，为什么选择日本而不是英美作为学习的榜样？对此，学界有多种解释。我想，最直接的刺激还是来自甲午战败。“师

夷长技以制夷”这一思路，已经从具体的船坚炮利，转为抽象的教育文化。用康有为《请开学校折》中的话来说，便是：

近世日本胜我，亦非其将相兵士能胜我也，其国遍设各学，才艺足用，实能胜我也。



康有为说这番话的时候，尚未踏出国门一步，依据的是第二手资料。五年后张謇东游，实地考察的结果，竟与康氏的意见不谋而合：“教育第一，工第二，兵第三。”（《东游日记》）其时大谈教育立国者，并非教育专家，而是一般的文人学者。翻阅清末大量关于教育的论述，你能明显感觉到知识者的良知，以及救世济民的热情。

近日购得一九〇一年创刊的《教育世界》数册，闲来把玩，深为编者罗振玉《教育私议》的高瞻远瞩所感动。以二十世纪为“东西消长最大之时机”，而成败得失，“一决之于教育”。如此大胆立论，想来今人也未能出其右。可诚如罗氏所言，以教育立国，“知之匪艰，行之维艰”矣。设想“教育果兴，三十年间必为大东强国”，依据的是“日本变法三十年而强”的经验；这比当初康有为“三年而立”的预言保守多了（《请飭各省改书院淫祠为学堂折》），可惜仍嫌过于乐观。去年访日，曾应《文》杂志之邀讨论中国的教育现状，实在无法解释清楚何以中国至今仍有两亿文盲。对于一个文盲比例高达六分之一的国度，如何称雄于二十一世纪，我不能不有所疑虑。

《教育世界》以大量译介日本教育法律及教科书而闻名，第一册《序例》后附有十一种“已译成之书名”。其中的《日本文部省沿革略》，大概就是我去年年初在海淀旧书店觅得



的《日本文部省沿革及官制》。此书原著者为日本文部省，译者为“出洋学生编辑所”，上海商务印书馆一九〇二年代印。书仅双面五十页，记录明治元年至三十二年间日本教育大事，述及“王政维新之初，固首在兴教育”的决策，以及政府的各项具体措施，肯定让那个时代的中国读书人感慨不已。

明治时代的大教育家福泽谕吉有些想法很有趣，比如在谈到日本“文明开化”之所以能够迅速展开时，将其归因于多数士人之“无知”：“日本士人的头脑有如白纸，一听说是国家的利益，立即印在心底，果断实行，毫不犹豫。”而深受儒教熏陶的中国士大夫，则各有其骄矜的看法，没那么容易被教诲（《福泽谕吉全集·绪言》）。以启蒙的声音过于嘈杂，或听众的立场过于坚定，似乎不足以说明何以在中国，“教育第一”始终只是一句口号。晚清以来，没有人公开否认教育的重要性。只是“百年树人”，对于习惯风云变幻的政治家来说，远不及“谁的国家”、“哪来的利益”更有切肤之感。不说特定年代对“教育救国论”的批判，就连知识者自身，也大都以只讲教育不问政治为可耻。

或许因为我父母都是教师的缘故，总无法破除对教育的“迷信”。从下乡当“孩子王”那天起，就命里注定只能在校园里徘徊。访学日本，自然以大学校园为主要活动场所。东京大学一地金黄的银杏，庆应义塾大学已经安静了一个世纪的三田讲堂，早稻田大学优雅的演剧博物馆，都让我流连忘返。可说实话，这些大学的辉煌历史，早就目睹耳闻，亲临



《演剧博物馆》

其境时并无多大的文化震撼。倒是在各地旅游，猛然间与有关教育的遗迹相遇，惊喜之余，会有一丝难言的隐痛。

读过《福泽谕吉自传》，最喜欢“绪方学塾的学风”一章，尤其不能忘怀的是那部轮流观看的《日荷辞典》手抄本。去年十月，到大阪参加中国学年会，第一件事便是拜访当年福泽就读的适塾。

绪方洪庵



绪方洪庵肖像

适塾为幕末著名兰学家、医学家和教育家绪方洪庵（一八一〇——一八六三）于天保九年（一八三八）所开办，关闭于明治初年。据现存《姓名录》，先后入门者达千人之众。明治时代的风云人物，多有出自适塾者，除福泽外，军界有大村益次郎，外交界有大鸟圭介，最为本色当行的医疗卫生界（包括红十字会）则有长与专斋、高村凌云和佐野常民等。适塾之名扬天下，除了办学者洪庵的学识过人外，更与日后学生的大有作为密不可分。当初是生以师贵，后来则是师以生尊——对于办教育者，最大的乐趣莫过于出人才。只是何者为“人才”，可能见仁见智。在日本，参观过许多校史纪念馆，夸耀的都是思想家、文学家、科学家等，未见以出总理、出部长为荣的。想来并非鄙薄官府，而是认定政学分途，政治家的成长主要不是得益于大学教育，大学也没有必要办成某一党派的根据地。

作为“国史迹”兼“重要文化财”的适塾，乃一八四五年由绪方购得，本世纪七十年代照原样拆散重修。如今，花两百日元便可“登堂入室”。真佩服日本人对空间的利用，这座在日本开国史上占有一席地位的学校，实际占地面积不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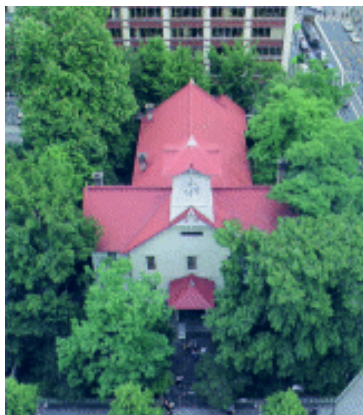
五百平方米。一楼除了教室、书斋、接待间、贮藏室和洪庵一家的住处，还有两个小庭园和一口水井。二楼的学生宿舍里，黝黑的木柱略显残缺，榻榻米上汗迹未消，油灯下那部珍贵的手抄本《日荷辞典》翻开着，只缺圈坐在四周的福泽们。似乎怕惊扰尚在念书的古人，平日喜欢啧啧称奇的日本游客，到了此地也都一脸严肃；女孩子则捂着嘴巴，强咽下那声必不可少的“哇”。旁边的小屋挂着许多照片和画像，那便是适塾引以为傲的历届“名学生”。

北海道大学的前身札幌农学校也有自己的“名学生”，那便是财政学家新渡户稻三、宗教家内村鉴三、植物学家宫部金吾、文学家有岛武郎。不过，农学校的首任校长克拉克博士（E. C. Clark）似乎广为人知。一百多年后的今天，克拉克的临别赠言“年轻人，要有雄心壮志”（Boys, be ambitious!），仍回荡在北海道乃至整个日本上空。克拉克在日时间不到一年（一八七六年七月三十一日到任，一八七七年四月十六日归国），影响竟如此深远，颇有点韩愈潮州行的味道。札幌农学校乃日本最早的高等农业教育机构，聘请的初任校长又是原美国马萨诸塞州立农业大学校长，随着农学校的学生在北海道开拓中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克拉克自然而然也就成了日本人心目中的英雄。

开拓北海道，大概是明治维新最少争议的一大功绩。在设置开拓使（一八六九）的第三年建开拓使学校于东京，第六年移至札幌并定为农学校，这些举措可作为日本教育立国的象征——须知那时整个北海道的人口仅有十万。百业待兴，首先想到的是花大价钱请外国教头，此事足见主事者的眼光：教育先行，人才第一。如今，占全国面积六分之一的北海道，已经成为日本经济最有活力的地区之一。作为局外人，

抚今思昔，也都感慨良多。

今年的暮春时节，依旧是落英缤纷。有幸来到日本的“北大”讲学，而且就住在学校里的克拉克会馆，每天面对着



北海道大学
时钟台

克拉克铜像，不禁神往于那个开基立业、生机勃勃的年代。只是今天绿草如茵的北海道大学校园，是明治三十九年（一九〇六）迁建的。当初农学校举行毕业典礼的演武场遗址，只留下一座被定为“重要文化财”的时钟台。那机械传动的大时钟还在运转，还在报时，还在提醒人们记住那个遥远的过去。我访钟台那天，春雨潇潇，绿荫中白墙红瓦，再蒙上一层水气，更显得温润可爱。雨天游博物馆，最大的

遗憾是地上的污水迹。没想到介绍农学校和时钟台历史的展厅一尘不染，就连入门处也干干爽爽。看着雨中忙忙碌碌抹地板擦栏杆的妇人们，我有点怨恨起日本人的“洁癖”来。事后方才得知，这些志愿者希望用这种方式来守护钟声并触摸历史。若如是，还真令人感动。

从暮春到初夏，我和妻子在日本各地旅游，居然接连见到好几处作为文物的明治学校遗址。熊本的洋学校建于明治

德富苏峰



四年，资历比札幌农学校还老，可惜只办了六年。不过，洋学校的学生德富苏峰后来接办大江义塾，门下又出了支持孙中山闹革命的宫崎滔天。我对九州的历史文化知之甚少，参观这两处遗址纯属偶然。住在水前寺公园附近，又只有半天空闲，最合适的去处莫过于公园及旁边的洋学校教师





洋学校遗址

馆。至于访大江义塾迹，则是因读洋学校的校史引起的兴致。

游览心切，赶到洋学校教师馆时，尚未开馆。大概难见到如此虔诚的游客，正在打扫卫生的管理员决定提前开馆，并热心介绍。这下子可麻烦了，馆里始终只有我们两个参观者，不好意思匆匆走过场，于是足足在这幢两层的洋式木楼滞留了一个多小时。日本的纪念馆大都布置得很认真，细看当然有好处；只是对于非专业的游客来说，一个多小时未免太奢侈了。

同样是没赶上开馆时间，长野的那一次可就没这么幸运了。从筑摩山地的度假村开车回东京，路经中込市，见到“国史迹旧中込学校”标志，自是希望“顺手牵羊”。可惜时近黄昏，纪念馆已经空无一人。日本人大多守规则，因此只在入口处横一道矮矮的铁链。实在舍不得这个机会，假装不懂规矩，跨过去尽情游览。拜会了樱花和枯藤，也见识了洋楼和大铁门，可就是没记住学校到底建于何时，有何功绩。本以为既是“国史迹”，必然大名鼎鼎，回家查一下辞典就行了；没想到翻遍各种有关教育的辞书，就是找不到此君。

真不知道日本人为其立国之本的教育事业，修了多少纪念馆，建了多少纪念碑！

一九九四年十月二日于京西蔚秀园



“厕所文化”

写下题目，自觉有点滑稽。年来“文化”成灾，无物不以之为名，且大有化腐朽为神奇的魔力。如今轮到我来凑热闹，竟然将其与人所不齿的“厕所”连在一起，实在不雅。可我并无调侃的意思，真的以为“厕所”里有“文化”——准确地说，一个社会的文明程度（包括公德心、科技水平、生活习俗、审美趣味等），在厕所里暴露无遗。

刺激我对这个问题的思考的，是一次偶然的对话。说起每个城市都有一种特殊的味道，当地人不觉，有经验的游客则一下飞机就能闻到。日本朋友说北京首都机场的味道是“大蒜”，并问我对东京成田机场的感觉，我答以“厕所”。说者无心，听者有意，对方颇为不悦，后来我才知道，幕未来日的西方人，正是以此攻击日本人的“不文明”。一百多年的励精图治，日本已经成为世界经济强国，正热衷于推销其



文化，没想到被我揭了“伤疤”。

其实，我没有那么刻薄，说“厕所”指的不是臭味，而是香味。在日本，不管是机场、剧院，还是旅馆、酒吧，厕所都非常洁净，而且洋溢着一种浓郁的香味。这种香味很容易分辨，以至我不用看标志也能找到厕所。主人一听解释，忙说“过奖过奖”；其实我的话里褒中有贬。以我迂腐的见解，过犹不及，厕所毕竟不是闺房，太香了让人感觉不自然。

东京的雅叙园是专门举行婚礼的大饭店，装饰很华丽，最让我惊叹的是厕所。除了必不可少的香味外，更因其小桥流水、修竹扶疏。关键时节，眼前掠过一倩影，不免胆颤心惊。据说，借“扶疏”的修竹作屏障，此创意得之于江户时代的便所；不过既已置身于现代化大饭店，自是不能不着力“雅化”。此厕所大受赞扬，我却甚不以为然，以为其俗在骨。我喜欢虽也修饰但不大夸张者，比如京都的“天喜”：顾客酒足饭饱，穿上木屐，在因灯光昏暗而显得有点幽深的小石板路上走十几步，来到干净得不必要使用香料的便所，那里甚至可以看得见星星、听得见虫鸣。

倘若不是像我这样吹毛求疵，日本的厕所其实值得称赞。受那场争论的启发，旅行时颇为注意各地的厕所，除了东京高尾山上寺庙外的一处，居然未见特别污秽者，听说北海道还有专门点评本地各处厕所的书籍，可惜我没见到。不过，确实发现好多公共厕所的建筑风格很特别，看得出设计者挺用心。家用厕所里层出不穷的各种小玩意，更是提醒你日本人在此“无关大局”的小事上所花的功夫。

记得夏目漱石曾将每日如厕作为人生一大乐趣，谷崎润一郎则称日式厕所为日本所有建筑中最有情趣者，其《阴翳礼赞》中有这么一段充满诗意的描述：



虽然日本式的茶室也很不错，但日本式的厕所更是修建得使人在精神上能够安宁休息。它必定离开母屋，设在浓树绿荫和苔色青青的隐蔽地方，有走廊相通。人们蹲在昏暗之中，在拉窗的微弱亮光映照下，沉醉在无边的冥想，或者欣赏窗外庭院的景致，此情此景，妙不可言。

谷崎君反对西洋厕所的铺瓷砖、安抽水马桶和净化设备，以为在那样通明透亮的地方解裤子，实在丑陋不堪，因而反过来故意渲染日式厕所的风雅与清幽。但谷崎君只说了厕所“雅”的一面，而不涉及其“俗”的一面，比如说如何处理雅人留下的不雅的排泄物，以及其先天具有的臭味。还有，对于没有自家“庭院”和“绿树浓荫”的平民百姓来说，谷崎君的设计未免过于奢侈。东京的“深川江户资料馆”里，有一座复原的江户末期庶民的公共厕所，附在本造的母屋边上，有顶盖故能避风雨，有灯笼故不怕黑夜。虽说够不上谷崎君的标准，但非常实用。对于拥有百万人口的江户城来说，处理年三百万石的排泄物，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实在风雅不起来——达官贵人则又另当别论。

江户末期庶民的公共厕所
(《深川江户资料馆》)



对比同时代北京的厕所，不难说明此等俗事之不易解决。孙殿起辑《北京风俗杂咏》中录有褚维垞的《燕京杂咏》，其中一首云：“汾浚曾无恶可流，粪除尘秽满街头。年年二月春风路，人逐鲍鱼过臭沟。”下有附注曰：“都城沟道不通，二三月间满城开沟，将积年污秽辟街左，触鼻欲呕，几不能出行一步。”

阙名的《燕京杂记》说得更可怕：



108

京城二月淘沟，道路不通车马，臭气四达，人多佩大黄、苍术以避之。正阳门外鲜鱼口，其臭尤不可向迤，触之至有病亡者。此处为屠宰市，经年积秽，郁深沟中，一朝泄发，故不可当也。

屠宰市的积秽尚情有可原，都城之所以沟道不通，主要在于平日里一般居民付不起淘粪钱，“故当道中人率便溺，妇女辈复倾溺器于当衢”。居于荒山野岭或者深宅大院，如厕当不成问题。可对于庶民来说，解决“臭气四达”，比强求“风雅”重要得多。

遗憾的是，此事大不雅，历代文人避之惟恐不及，以至难得详细的记载。读书人很容易想到钱惟演的“坐则读经史，卧则读小说，上厕则阅小辞”；也不难记得欧阳修的“平生所作文章多在三上，乃马上、枕上、厕上也”（《归田录》），可很少人知道宋人厕所建筑怎样，味道如何。这也难怪，此事虽十分重要，确实无法归类。“岁时风物”说不上，“礼仪职业”也无关，即使是有心人，也不知该如何记载。说起来和“衣食住行”中的“食”与“住”沾点边（如今成套的住房或营业的酒馆都必备厕所），可明人高濂的《遵生八笺》中并列温阁、松轩、茶寮、药室，就是不设厕所；至于清人袁枚的《随园食单》，更不会考虑“吃喝”以后必不可少的“拉撒”。近人李家瑞编《北平风俗类征》，好不容易收录了几则关于厕所的文字；只是无法归类，最后只能因其中一则提到雇人淘粪“必酬以一钱”，勉强将其归入“市肆”编。其实李先生心

里肯定明白，厕所并非完全服务于商业往来。

说来惭愧，我对于中国厕所的建筑特色，至今仍很茫然，无法与谷崎君对谈；至于对其除臭方法的最初了解，竟得之于一部大雅书。《世说新语》述石崇入厕，十余婢侍列，且“置甲煎粉、沉香汁之属”；王敦不知公主厕所漆箱里的干枣是用来塞鼻子的，竟“食遂至尽”，闹出大笑话。以干枣塞鼻，原料倒也不算太贵，就是感觉憋气。至于“甲煎粉”、“沉香汁”为何物，我没作考证，就怕弄明白了也买不起。不管怎么说，我们的先人肯定也很重视如厕时的舒适感，只是因此事“不雅”而很少形诸笔墨，害得后人无从模仿或改进。此乃一大憾事。

明治维新以前的日本厕所，是否比同时代的中国厕所优雅舒适，在找到确凿证据以前，不敢妄下结论。倒是十六世纪来日的葡萄牙传教士路易斯·弗洛伊斯（Luis Frois，一五三二——一五九七）所著《日欧比较文化》，让我们知道那个时候日本的“厕所文化”。既然是比较，主要着眼于差异，凡事皆两两相对，不免略有夸张；不过据日译本的注释，所记也还大致属实。略去欧洲人的习俗（读者不难反推），日本人的特点是：厕所在房前，对谁都开放，蹲着大便；有人为买粪尿付出大米和钱；把人粪投入菜园当肥料。除了公共厕所不大普遍外，后三点与中国没有任何差别。在很多偏远的地方，人粪至今仍是菜园的主要肥料。七十年代初期我在粤东农村插队时，生产队经常派人上城买人尿。至于“蹲着大便”，更是无伤大雅，首先想起的例证是废名《莫须有先生传》中的名言：“脚踏双砖之上，悠然见南山。”

把“大俗”和“大雅”凑合到一起，废名此语略带调侃的意味。周作人在《入厕读书》中，曾抱怨北京那种“只有





一个坑两垛砖头，雨淋风吹日晒全不管”的茅厕。此等去处，倘遇风雨，实在难以“悠然见南山”。个中滋味，下过乡插过队的，大致都能领略。没有屋顶的厕所，偶尔也有好处，比如“观风景”。可比起日晒雨淋的不便来，这点“风雅”我宁肯牺牲。

谷崎君大概没有真正在“粗野”的乡间生活过，才会在《关于厕所》中提出如此过于“风雅”的设想：

总之，厕所最好尽量接近土地，设在亲近自然的地方，例如在野草丛中，可以一面仰视青天一面排泄。类似这样粗野、原始的厕所，最叫人心情舒畅。

这样“粗野、原始的厕所”，我有幸光顾过，可惜心情不甚舒畅。小时候生活在大山脚下，那是一所农校的宿舍区，几十家住户，厕所则只有五六个位子，且颇为污秽。于是，每天清晨，我都跑到离宿舍区四五百米远的竹林里“方便”。竹林很大，可以不断转移，排泄物也自有野狗和屎壳螂来处理。如此“风雅”的去处，实有诸多不便。一怕风雨，二怕黑夜，三怕肚子不争气，四怕“莫道君行早”……每念及此，不敢随便附和谷崎君的大雅主张，还是老老实实当我的“俗人”好。

其实，谷崎君也只是说着好玩，并没真的希望恢复露天厕所；要不，就不该大谈京都、奈良的寺庙里那些古色古香、洁净无瑕的厕所如何可爱。据我所知，那些厕所都有挡风避雨的设施。周作人的《入厕读书》和《读戒律》，均提及印度先贤十分周密地注意于人生各方面，包括入厕的各种规定，没有故作姿态，全都入情入理。以前游寺庙时，只顾观赏佛

像之庄严，从没想到注意其厕所。此次东游，在京都的东福寺，第一次看到昔日“东司”之辉煌。东司也叫东净，乃禅林东侧的厕所。东福寺的东司建于室町时代（十五至十六世纪前期），现为国定的“重要文化财”。此东司长约三十米，宽约十米，其建筑风格虽不如被定为国宝的三门华丽，却也质朴中透出一种庄严。与周围的三门、大殿、禅堂相比，一点也不觉得寒碜。如果不是特别说明，游客大概很难想像，那么漂亮的建筑竟是和尚净手之处。



111



东福寺

《水浒传》中大英雄鲁智深，委身东京大相国寺，只当了个与“管饭的饭头，管茶的茶头，管东厕的净头”并列的“管菜园的菜头”。照知客的介绍，“菜头”也罢，“净头”也罢，都是“末等职事”。“净头”职位虽低，工作却甚为重要。想像施主正在大堂虔诚礼佛，忽从附近的东司飘来阵阵不雅的味道，该是多么扫兴，说不定大笔奉纳就此落空。很想知道，古时的净头是如何“化俗为雅”的；几十个位子的大厕可不是容易管理的。不知是出于保护的目的，还是没人对此



感兴趣，东福寺的东司并不开放。我只好踮起脚尖，从窗户往里窥探。除了排列整齐的几十个土坑外，就是一幅解释性的绘画。画面上，如厕者之间没有屏障，感觉似乎有点不对：精通人情物理的和尚，不该让人们互相观看排泄时的丑态。

回家翻书，果然不出我所料，《摩诃僧祇律·明威仪法之一》有云：“屋中应安隔，使两不相见，边安厕篋。”厕篋也叫“厕筒”、“厕筹”，乃大便后用以拭秽之木竹小片。厕所边上插着木竹小片，这情景我还依稀记得。能用自身经历印证千年古书，真说不清应该是喜还是悲。

一九九四年八月二十三日十八时完稿于蔚秀园

【附记】

十年前在五台山买关于佛家戒律之书籍，被拒绝；理由是此等“内部文件”，不卖给在家俗人。大约是五年前，在家乡潮州开元寺，请到唐道宣律师删定、近世高僧弘一法师手抄之《四分僧戒本》，自是大喜过望。写完小文，忽忆及此书，取出翻阅，叹服佛家之体贴人情物理。规定“不得生草上大小便涕唾”，“不得净水中大小便涕唾”，“不得立大小便”，自是体现其“勿使余人恼”之慈悲情怀；可接下来都有一句“除病，应当学”，即特殊状态下可以变通。僧人也是人，“慈悲”既及于俗人，当然也及于僧人，故不作“过甚之辞”。



后 记

将社会与人生比作“大书”，图书馆里收藏的，也就只能定义为“小书”了。借“大书”参悟“小书”，或者以“小书”品味“大书”，此乃读书人的常态。所谓“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或者“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常被世人挂在嘴上，真正落实起来却不容易，弄不好大书、小书全耽误。抱着名胜词典，口中念念有词的游客，或者按图索骥、打破沙锅问到底的专家，我都深表钦佩，又都略感遗憾：其开口见喉咙的观赏思路，以及过分僵硬的阅读姿态，都显得不够“优雅”与“洒脱”。

“阅读”这一行为，在我看来，本身就具备某种特殊的韵味，值得再三玩赏。在这个意义上，“阅读”既是手段，也是目的。只是这种兼具手段与目的的“阅读”，并非随时随地都能获得。即便是擅长读书者，也常有状态欠佳的时候。我



不大相信苟能立志，读书便与“天时地利人和”无关的说法。在一个恰当的时空，碰到一个契合你心境及趣味的阅读对象，而且你有足够的时间及知识准备来仔细品尝，这样的机遇并不常有。

作为“专家”，我还会埋头书海，皓首穷经；作为“游客”，我又常天涯海角，走马观花。后者太飘浮，前者太沉重，都不是理想的阅读状态。有时突发奇想，如果给我一年时间，允许不带任何功利目的，完全凭个人兴趣读书，那该多好！对于积蓄无多、当不起隐士的现代人来说，这一本来极为平常的阅读方式，反而显得有点近乎“奢侈”。

不过，老天不负有心人，机会终于还是来了。

在日一年，除了继续专业研究，更多的时间和兴趣集中在我所不熟悉的日本社会与文化。坐在东京街头随处可见的小酒馆里，与日本朋友畅谈上下古今、“东西”“南北”；或者大太阳底下，与妻子骑单车在京都的大街小巷里游荡，迷路时再掏出地图确定方位，这种感觉真是好极了。就像钻到邻居的花园里胡乱转悠的小孩子一样，出于好奇，也会偷摘一两朵自家没有的玫瑰，但不准备做植物学鉴定。不管此前还是此后，我都不是，也不敢冒充是日本学专家。

正因为连“日本学”的门槛在哪儿都不知道，也就没有入门与否的焦虑。这是一次介乎“专家”与“游客”之间的愉快的“阅读”。或者说，是一个“训练有素”的“外行”在“看风景”。

“看风景”既是象征，也是写实。以我可怜的日语能力，对日本的阅读，得益于大大小小的图书馆，更得益于东西南北的旅行。面对古寺、红梅，或者用汉字书写且“犹存唐代遗风”的匾额（周作人《苦竹杂记·日本的衣食住》），真有

“宾至如归”的感觉。可看着看着，“熟悉”的外观渐渐退去，骨子里的“陌生”让我震惊。那些从书本上得来的中日文化交流佳话，以及初次访问时的似曾相识感，似乎涵盖不了眼前的风景。终于有一天，明白了一个简单的道理：并非每个中国人，都有谈论日本的资格。日本对于我，就像罗兰·巴特的《符号帝国》所描述的，也是“遥远的国度”。

也正是这种“遥远”的感觉，刺激了我阅读的兴趣。明白日本文化不是中国文化的“复制品”，我的“外行”身份也就不证自明。努力去体味、去鉴赏另一种文化，这既需要学识，更需要好奇心。学识我谈不上，好奇心却“大大的有”。明知永远成不了日本学专家，还是津津有味地阅读“日本”这本大书；如此如痴如醉，连我自己都觉得好笑。一开始还自我安慰：这种节外生枝的阅读，对我的专业研究会有潜移默化的影响，做学问不就讲究触类旁通吗？很快地，意识到不该如此“动机不纯”，干脆放下包袱，轻装上阵。承认此乃“自己的园地”，不必上税，也就不必过分计较收成。

很高兴自己没有专业化完全剥夺了对新鲜事物的兴趣，还能为一本陌生的大书而激动，并且不计成本地投入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尽管从经济学角度考虑，这绝对得不偿失；可作为一个活生生的人，我愿意“逸出常轨”，为这一愉快但不明智的阅读付出代价。

比起径行独往、无法无天的大侠来，我的“逸出常轨”实在微不足道，而且只是暂时的。就好像比赛中间的“暂停”，只是为了让运动员调整一下呼吸，本身并不具有独立的意义。回到国内，我又成了“专家”，整日为担当的研究课题而埋头书海，难得再有时间和心境顾及我的业余爱好。很想把心中的风景完整地描画出来，可惜时不我待，只好允许其“半





路出家”。不像断臂的维纳斯女神塑像，这里的残缺，不具备古雅的韵味或神秘的美感，只证明作者的写作缺乏恒心与连贯性。在对读者表示歉意的同时，我暗暗下了决心……既然“决心”只是“暗下”，又何必公诸于众呢？

还必须说说“训练有素”，否则显得不够真诚。不同于一般游客，我对日本的历史文化毕竟有所了解，而我所关注的晚清以来中国文人在日足迹，更成了最好的导游手册。虽然此“训练”非彼“训练”，我的专业知识基本无助于我对日本的了解，但我的专业训练使得我比较容易进入“课题”。更重要的是，每当我欣赏一幅风景，或者阅读一段史迹时，不自觉地，总是以我的知识背景为参照系。至于思考问题的方向，更是受制于当下的生存处境及精神需求。尽管我是日本学的外行，也充满了儿童般的好奇心，却并非天真纯洁得如一张白纸。说到底，“前理解”决定了我的阅读策略及方向。

这种解不开的“中国情结”，使得眼前的问题与心中的困惑不断对话，往往出现旁人难以理喻的“风云突变”。说是在“阅读日本”，又好像在借日本“阅读中国”，这种视角的转移，连我自己也无法准确把握。比如，我会在小酒馆里与日本朋友脸红耳赤地辩论所谓“东方的崛起”，或者有意挑起关于知识分子历史命运的话题，甚至选择日本的剑豪与中国的侠客作为演讲题目。当时的感觉似乎是“友情出演”，事后方才明白乃“主动出击”。为何有的话题我马上插嘴，而且手舞足蹈，以求冲破隔阂；有的则老是听不懂，即便听懂了也无法进入最佳工作状态。除了语言表达能力，还有阅读趣味在作怪。

正是这种“问题意识”，决定了这半部书稿之对待日本文化，注重体味而不是批评。得知我在撰写访日观感，曾有

朋友表示愿意译成日文发表，条件是“痛下针砭”，以便警醒“狂傲的日本人”。我没有采取这一策略，原因是意识到自己的阅读，受制于“中国的”而不是“日本的”问题。借用鲁迅《出了象牙之塔 后记》中语，我的写作，“并非想揭邻人的缺失，来聊博国人的快意”。在我看来，每个国家的知识者，都应该首先关注并鞭责本国政治生活及精神文化的发展；学有余力，方才“负有刺探别国弱点的使命”。我对日本的阅读，带有浓厚的中国问题意识，尚停留在借日本“阅读中国”的水平，这也是我自居日本学“外行”的原因。另外，作为“旅人”，心境超然，不同于生于斯长于斯的“国民”，对异国生活及情调多取鉴赏态度。鲁迅赞赏厨川白村对本国世态“一一加以辛辣的攻击和无所假借的批评”，但也称：“我先前寓居日本时，春天看看上野的樱花，冬天曾往松岛去看过松树和雪，何尝觉得有著者所数说似的那些可厌事。”

自忖没有本事兼及中国与日本、大众与专家，于是有了以上种种自我辩解。这种写作策略，与当下本人的心境相通，没必要另外去“深化主题”、“转换视角”，因而显得相对轻松与洒脱，与前面提及的对优雅阅读姿态的追求大致吻合。

书名《阅读日本》，本不该冒出第四辑所录文章。与其费尽心机打圆场，不如老老实实承认：此乃不得已而为之。

虽说随笔集不同于学术专著，不一定非绕着一个题目打转不可；可没能完成预订计划，心里总不是滋味。

挑了几篇题外之文，一来充篇幅，二来也可见笔者对于“文”与“学”关系的思考。对我来说，探讨中国散文的艺术特征及发展途径，既是一个学术课题，也是一种自我训练。但愿题目的“学究气”，不至于吓跑那些更欣赏“才情”、更



追求“潇洒”的朋友。

至于褒贬晚明小品、桐城文章，或者评述学者之文，并非拉大旗做虎皮，暗示自家文章“别有渊源”。我想，这点嫌疑总该可以避免的吧？

题为“结缘小集”，自然是源于周作人的《结缘豆》。像《燕京岁时记》所述的，于佛诞日“煮豆微撒以盐，邀人于路请食之以为结缘”，这种雅事如今难得一见；不过，学周氏以文代豆，与读者结缘，倒是不妨试试。

一九九五年六月二十一日初稿，七月十七日改定

